

西南财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近代四川药材市场研究

姓名：尚元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经济思想史

指导教师：刘方健

20081101

摘要

关于我国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四川的市场发展状况目前学界尚鲜有人研究。本文从四川省情出发，以学术界目前很少注意的近代四川药材贸易研究为切入点，力求全面真实的反映近代以来四川商品经济发展情况与市场发育度。

全文分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

前言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四川经济地理的研究做了总结，从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两方面说明了此论文的选题缘由。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阐述了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部分阐述了四川药材生产与传统药材市场的历史，最早的药市即出现在中唐时期的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那时的梓州便为一个较大的药材集散地。梓州药市的发展推动了全国药材的流通与生产，对当地医药经济发展更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古代药市的特点之一是与药王庙会等民间习俗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四川的药材市场因为受交通条件所限，基本是属于小范围的区域性的市场，如梓州，虽是最早的专业性市场，但是规模有限，影响范围也难以达到全国。重庆开埠后，川江现代航运开通，四川的对外药材贸易逐渐兴盛，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药材市场网络，几十年的商业发展使四川药材贸易无论是在四川对外省还是对国外贸易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第二部分分析了四川药材市场繁荣的原因，文章认为四川药材市场繁荣分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有地理条件与近代运输条件，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中药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四川历来为药材的主要产地，境内产药地带，分布颇广；近代运输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交通的近代化是经济近代化的必要前提，随着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国对长江上游交通的开辟，轮船航运、交通公路甚至航空等现代交通陆续在四川境内出现，使四川的药材业贸易更趋繁荣。

内部因素从药材生产者农民、药商以及政府来考虑。清末民初大量的赋税与债务致使农民从各方面寻求出路，种植药材就是其中的副业之一，它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大大活跃了四川的农村经济。同时，四川药材贸易的不断发展，使得省内省外的药商陆续组织起来，建立行会，形成药材帮口。这种药业公会是药商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行会组织，内部制定有规章制度，摊派捐税，甚至可以行使处罚。经营组织形式也通过专业分工，不同部门各司其职，经营组织大致可以分为字号、行栈、铺户三类。就药材市场而言，政府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它制定相关的制度，设立相应的卫生行政机构实行监控和管理，促进药材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药材业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税收，政府财政收入大增，但民国以后各界政府针对药材业的苛税不断增加，以致于后来成为扼杀四川药材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部分分析了市场运行体系，叙述了几个重要的药材集散市场：重庆市场、成都市场、万县市场、中坝市场、宜宾市场和灌县市场以及市场交易概况、药材业与金融业的发展状况。

第四部分分析了抗战之后四川药材市场衰落和萎缩的原因以及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四川 近代 药材市场 药帮 区域经济

Abstract

Fo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Sichua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there are still few academic studies. Beginning with the situ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taking the modern medical herbs trade research to whic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paid little atten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will try best to fully and tru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degree of market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ince the earliest medicine market appeared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Zi state City of Sichuan and developed nearly thousand years, with Chongqing ports opened and chuan jiang opened at th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medical herbs market in Sichuan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small regional market to more mature market nets covering the whole country such as the northwest,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Guangdong and Guangxi, and even the world . With the help of organizations-medicine gang, as well as the operators-zihao, Stack line-xing zhan, and shop-pu hu, medical herbs are carried into whole count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rom the origin market to distribution market, and then to export markets. In the marketing process, the whole medical herbs market system changes w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changing.

The full paper is comprised of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Introduction will summarize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Sichuan by academic community, and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why choose this topic from th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body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troduc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first part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medicinal herbs and traditional market of medicinal herbs in Sichuan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modern medicinal herbs trade in Sichuan Province's foreign trade and in the country's

export trade. The second part will analyse that why the medicinal herbs market in Sichuan is so prospered.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wo reasons: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External factors are the following: a uniqu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n Sichuan, as well as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by improvement of modern transport conditions. Internal factors are considered as follows: the producers of medicinal herbs-farmers' benefit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market-medicinal herbs traders, as well as the organizers and regulator of the market-government. The third part will show the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market, describing several important medicinal materials distribution market, as well as their trading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industry. The fourth part will analyse the reasons that why the medicinal herbs market in Sichuan was towards shrinkage and decline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it brought 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broad history, and simultaneously analyses why medicinal herbs market in Sichuan came to prosperity first, and then went to decline in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hoping that it can give us some reflection and inspiration.

Key words: si chuan , Modern time, Medical herbs market, Medicine gang, Regional economy

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及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本学位论文引起的法律结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本学位论文成果归西南财经大学所有。

特此声明

学位申请人：

年 月 日

绪论

中国的近代市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叶，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鸦片战争，用武力扣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国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通商口岸开放，外国洋行林立，进出口贸易增长。长江中上游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特殊性，相对偏安一隅，19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还是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当中，未像沿海那样受到严重的冲击。直到19世纪末期重庆开埠、口岸开放后，外国经济势力逐渐渗透到长江上游地区，洋纱洋布等洋货开始涌入四川地区，同时四川的桐油、猪鬃、药材等也出口到国外，长江上游地区加入到世界贸易的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分解，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的市场也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对于近代四川社会经济的变迁，学界众多学者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角度给予解读，一种是站在整个四川市场的角度，如王永年、谢放的《近代四川市场研究》^①该文从鸦片战争前后四川市场结构变化、鸦片战争对自然经济破坏与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三个方面对近代四川市场的变化进行分析与探讨；一种是研究整个四川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如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②，本书着力于过去人们忽视的人口与人口压力问题、士绅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地方军事问题、近代警察问题、新旧教育体制问题等方面勾画了清代长江上游社会与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而研究子市场又多以粮、棉、丝、盐、茶、猪鬃、桐油作为对象。同样作为近代四川对外贸易大宗的药材贸易和药材市场，则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针对药材的史料与

^① 王永年、谢放：《近代四川市场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期

^② 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

文章也相对较少。

专门研究药材的文献出现较早，北宋时，杨天惠所著《彰明附子传》，对江油附子的产区、栽培、收采和品种鉴定等作了系统的考察和总结。民国时期开始，川药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学者对川药的关注逐渐增多，如张肖梅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①中，对川药独设一章，对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做了详细著述；中国银行重庆分行专门著有《四川省之药材》^②，也是对药材主要品种与产地做了统计与描述；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③、周开庆《四川经济志》^④等著作中亦对药材行业有所提及。但是这些著作中，大多只是对各种药材的主要产区、特性做简单描述，仍属资料汇编性质，并没有过多加工与分析。今人对四川药材业做历史研究的人并不多，有鲁子健的《近代四川的土药经营》^⑤，对土药的种植、经营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过叙述与分析，但是土药主要是指鸦片的种植；严奇岩《近代四川山货开发研究》^⑥对近代四川山货开发以及对农业结构变化和农民生活变化的影响做出分析，但是对于药材这一大类并未过多提及；四川大学陈镜颖的《四川药材贸易研究》，从药材的土壤气候条件、药材贸易运销等对四川药材的贸易做了相关的研究^⑦，但是对于市场内部诸要素并没有详细分析；游时敏著《四川近代贸易史料》^⑧、张学君《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⑨等也对四川主要药材产区，以及重要的药材市场做了基本的描述。总的来说，大部分已有的针对四川药材生产文献资料都是关于药材种类介绍、药材产区分布等介绍，鲜有将整个药材市场作为研究对象融入近代四川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研究的。

所以，本文试图围绕“药材”这一中心词来还原近代四川的社会经济原貌。力图剖析整个药材市场的各个组成因素，弄清楚市场产生与运行的内在机制，并分析在近代化的浪潮中，传统的药材行业与中医药如何逐渐走向衰落，运用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来证明市场形成到发展的过程。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② 《四川省之药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1934年

^③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④ 周开庆：《四川经济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

^⑤ 鲁子健：《近代四川的土药经营》，《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2期

^⑥ 严奇岩：《近代四川山货开发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⑦ 另外四川大学07年毕业论文陈镜颖同学《四川药材贸易研究》，由于中国知网于08年11月才添加，之前并未能收集到信息，故论文撰写期间认为此题材尚无人涉及。

^⑧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⑨ 张学君 杜受祜：《近现代四川经济场镇经济志》，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 四川药材贸易的历史概况

1.1 川药生产的历史与传统药材市场

药材市场的繁荣，与我国自古以来的中医药事业分不开。中药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是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谓“诸药草类最多，诸药以草为本”。由于中药的来源以植物性药材居多，使用也最普遍，所以古来相沿把药学称为“本草”。

药学理论的发展，对药材业影响深远。随着各种药材的发现与应用，药材的采摘、种植开始成为许多平民百姓的谋生手段。一种药材被应用到中医，就会有农民去挖采、种植，会有山客去收集，拿到药栈去交易，药栈则卖给远近的商人，商人则卖给中药店铺制成中药，随着药材种类渐渐繁多，西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了高产药材区。

四川素有“中药之库”之美誉。首先，四川的中药材种类多、分布广、藏量大，资源品种占全国药材的四分之三。据 1986 年政府组织普查队统计，全省中草药 4103 种，隶属 287 科、1269 属；动物药 102 种；矿物药 38 种。总蕴藏量 100 亿吨以上（其中植物药 100 余万吨，动物药 1 万余吨，矿物药 100 亿吨），居全国之首^①。其次，四川药材生产历史久远，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黄连生巫阳川谷及蜀郡太山之阳。……惟取蜀郡黄肥而坚者为善。……以雅州、眉州为善。”^②据《唐书》记载，政府规定四川境内各州“土贡”药材达 40 多种，主要有：麝香、羌活、附子、天雄、厚朴、当归、羚羊角、犀角、天门冬、红兰、丹砂、牛黄等。当时四川共辖 40 个州，其中 34 个州标有上贡药材^③。足见四川药材药区广阔，品质优良，生产发达。民国《灌县志》

^① 四川省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编：《四川省中药资源普查目录》，1986 年，第 3 页

^② 李时珍：《本草纲目》，五十二卷

^③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407 页

记载：“河西商务以川芎为巨，…岁约四五百万斤。”^①解放后我国编写的《中国土产综览》也载：“灌县抗战前产川芎 150—200 万公斤，抗战时产 60—65 万公斤，1949 年产 85—100 万公斤，1950 年产 60 万公斤。”^②丰富的药材种类和产量，保证了四川地区做为药材生产与供应地其重要性必然被凸显。

1.1.1 最早的药市

据可查史书记载，最早的药市出现在中唐时期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宋陈元靓《岁时广记》有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明而散。……逮国朝天圣中，燕龙图肃知郡事，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③王昌遇乃唐代一位较有名的道人，清代董谷士、董炳文撰《古今类传》有载：“蜀中落魄仙姓张，尝卖鼠药于梓州，狱吏王昌遇市药以归，鼠食之，皆翼而飞。后昌遇至泸州，又遇之，乃易其药，饵之，遂名昌遇为阪马，令乘以归，乃龙也。归梓后，以九日飞升”^④。从上文两段古文中可以看到梓州当时药市交易在夜间举行，“递明而散”，因为交易的盛况，甚至将交易期限延长几日，可见中唐时期的梓州便成为一个较大的药材集散地。

最早的药市出现在四川梓州不是偶然的。梓州城筑于南朝元嘉年间，左带涪水，右连中江，陆路北通当时的京城长安，南达蜀府成都，居水路交通要冲。北方药材经汉中运入四川，四川药材北运去中原，大都要经过梓州，同时，梓州及邻近诸州也盛产药材，所以唐代的梓州药业十分发达，吸引了甚至国外波斯的药商在此定居经营香药。王昌遇在当地及省内外药材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去世之时，各地药商汇集梓州悼念并开展药材交易，以后传习下来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古代“药交会”，当时称谓“药肆”。

梓州药市的发展推动了全国药材的流通与生产，对当地医药经济发展更

^①《灌县志》，叶大镛等据民国 22 年重修影印本，巴蜀书社，1992 年，第 52 页

^②《中国土产综览》，中国土产公司编印，1952 年，第 157 页

^③引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3 页

^④（清）董谷士、董炳文：《古今类传》，卷二，“群仙录”，未学斋，清康熙 31 年刻本

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四川的药材生产逐渐增多，甚至成为纳贡的物品。梓州的这种定期药市交易的形式很快为成都府效法，后来全国各地皆此形式，全国性的祁州、百泉、樟树三大药材交易市场，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而唐末五代时期的成都药市，发展的规模则大大超过了梓州，并且在白天举行^①，《岁时广记》有载：“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②帅守设酒欢迎商人进入药市的场面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对药材市场以及商业的支持态度。反映药材市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药市中川产道地药材很多，川芎、川大黄、麝香堆积，也有进口的人参、犀角。还有一千钱一粒的成药解毒丸。《铁围山丛谈》记载：“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③。

1.1.2 传统药材市场形式：交易成本的最小化选择

古代药市的特点是与药王庙会等民间习俗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即“庙会市场”。庙会大约出现于中唐时期，规模逐渐扩大，是天然的消费市场。庙会市场到明清时期已十分普遍，成为城乡间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活动形式。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庙会的经济功能逐步加强，以至达到“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偈呼庙者一”的地步，有些庙会甚至转化为纯粹意义的商品贸易市场^④。

庙会市场是一种定期集市，有一年一次，一年两次，一月数次。如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相国寺庙会，“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中庭两庑可纳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各类商品集中在寺内某一块区域，包括药

^① 梓州药市为夜间举行。

^② 引自伯赞、郑元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93页

^③ 马继兴：《宋代的民营药局》，中国医学杂志，1992年，（增刊），第3期

^④ 仲春明：《中国的庙会市场》，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第五期，60页

材在内的各种商品无奇不有，甚至“诸路罢任官员”也在此地出售香药^①。

随着医药经济发展，药市逐渐增多，规模逐渐扩大，药商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群体，他们希望有可供自己信仰与供奉的圣人和庙宇，这种庙宇有两种好处，首先是使药材业者有了行业的崇拜对象，其次是有了固定的专门交易场所。历史上各地药王庙供奉的药王的原型并不相同，有伏羲、神农、黄帝、歧伯、扁鹊、华佗、王叔和、陶弘景等等。药王庙会的增多使各地的大小药市相应增加，由药业行会组织举办的庙会活动，使祭庆活动和药材交易更加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各药王庙会会期长短不同，少则几天半月，多则一月两月。整个祭庆活动包括祭拜药王、药王巡街、请班唱戏、庙会庆宴、药材交易、切磋技艺等等。如“灌县太平场（今都江堰市青城乡）药王庙会，将药王孙思邈塑像抬出巡市，随行者敲锣打鼓，唢呐鞭炮齐鸣，声响震彻街市，旁观者逾万人；剧团必唱之戏为‘坐虎针龙’，赞颂药王的医术和医德。比邻的什邡县莹西镇药王庙会，孙思邈塑像坐八抬大轿，由青白旌旗开路巡市，众人争相观望，以目睹药王为幸事，喜庆场面同样热闹非凡”^②。小型的药王庙会，如洪雅于4月28日药王会，有县城和乡村中医、药商百余人参加，药王庙设在城隍庙后院。拜祭药王后，中医切磋医术，药商相互交易，中午一餐药王宴后散去。庙会中的药材交易实行先进买卖或以货易货方式，各地药商或船装、车载、人挑、驮运等方式将货药提前运到，药材成交之后收入十分可观。

古时之所以会以庙会交易的形式出现是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从产量和需求来讲也不可和今日相比，对药材买者而言通过定期的“庙会市场”方式，能够节约信息收集成本^③，因为在非庙会时期，药商想要收集药材是很困难的（当时并未形成专门经营药材的药栈，卖者多为“山客”也就是挖药人这种个体形式出现）；对卖者而言，只有在庙会上才会有如此多的消费群体，可以节约管理费用^④。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庙会有限的集期自然不能满足商品交易者的需求，庙会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场镇经济，至民国时期，

^①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② 周汶、徐国成：《古今药都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③ 包括质量、价格等信息。

^④ 药材不同于其它商品，保存需要去皮、翻晒等加工

四川场镇就发展到 4000 多个^①，集期也发展为一月几次，甚至十天两场、三场、四场、“日日场”，灌县的石羊场，便是著名的川芎药材集散地。

1.2 四川药材贸易的重要地位

古代四川的药材市场因为受交通条件所限，基本是属于小范围的区域性的市场，如上节所述的梓州，虽是最早的专业性市场，但是规模有限，影响范围也难以达到全国。明清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四川的药材市场与药材贸易开始由区域性的贸易拓展到全国甚至国际间。特别是重庆开埠后，川江现代航运开通，四川的对外药材贸易更是兴盛，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药材市场网络。

清末以前，川内口岸贸易并无详细记述，1891 年重庆开埠后，清政府设立海关，四川的对外贸易遂有了详细的记录，下表是 1891 年—1949 年解放前土货出口总值及主要的商品记录：

1891—1949 年四川省土货出口总值及主要商品表^②

出口总值：万关两

年度	土货出口总值	生 丝 (担)	猪 鬃 (担)	羊 皮 (万张)	桐 油 (担)	木 耳 (担)	生 漆 (担)	白 蜡 (担)	夏 布 (担)	中药材 (万关两)
1891	138.96	13154	568	/	/	1532	/	3642	/	34
1892	302.11	14113	3816	/	/	3304	/	8390	72	87
1893	366.72	16443	5146	/	/	1925	23	7672	/	103
1894	499.76	13771	6416	0.6	/	2786	/	10865	/	105
1895	639.67	11837	5410	1.4	/	1155	/	11119	/	113
1896	522.32	13048	5752	5.5	/	3763	/	9595	47	113
1897	675.12	11650	6179	/	/	4020	/	9756	/	130
1898	588.77	10853	5174	0.4	/	1431	/	9979	/	137
1899	883.27	14771	6289	303	/	850	/	17193	/	158
1900	699.30	13876	9264	6.4	/	2108	/	9296	/	116
1901	911.49	18573	8070	18.7	/	2812	/	10536	48	167
1902	863.90	20986	9148	42.9	/	1600	/	9851	29	196
1903	827.67	21290	11174	59.1	155	3152	/	5879	3	157
1904	1095.2	21894	13009	79.7	/	5943	135	7426	225	211
1905	1116.9	19516	9213	87.5	/	6132	/	5634	605	183
1906	1089.2	20738	8575	104.2	/	8452	1	10109	2034	183

^① 数据来源于张学君、杜受祜：《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 年，第 4 页

^② 《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26—427 页

1907	1107.9	18599	8973	79.9	/	9064	1	9004	3398	237
1908	1299.0	19912	10879	85.4	/	7419	1	6152	5317	230
1909	1417.7	31104	12212	137.7	/	4959	9	7555	2876	216
1910	1549.1	23972	14587	135.7	/	5196	7	10964	5107	232
1911	1006.9	18403	14477	113.5	/	4515	7	10081	4618	214
1912	1107.9	12838	13017	152.7	/	10386	173	5055	5269	198
1913	1213.3	28824	15355	156.3	66	7267	216	6523	4277	244
1914	1385.9	32242	16019	103.3	9	10611	335	4314	5834	251
1915	1653.7	26234	15953	193.3		10388	213	7784	6386	288
1916	1780.3	29855	12176	234.3	188	8519	135	6119	7030	252
1917	1631.6	28199	11830	128.4	31180	8039	113	5568	4810	238
1918	1753.8	38644	15391	190.2	64768	5360	1664	11760	5383	245
1919	1978.5	32767	11448	375.5	55375	5282	1532	7473	7808	275
1920	1404.7	15483	10388	88.7	45529	1478	551	4168	9739	243
1921	2166.6	21927	10230	282.1	64021	5669	2124	6819	12978	264
1922	2763.1	25204	14695	180.5	232166	6430	2092	4872	13211	247
1923	3273.3	32147	12938	162.4	267447	7142	2317	7357	12225	252
1924	3434.1	26691	14401	124.01	346555	8506	3008	7975	15376	416
1925	3274.4	25227	14522	16.7	313179	7070	2573	3764	10804	344
1926	2582.2	31667	9770	161.3	233859	7513	6048	3886	12006	361
1927	3323.6	18207	10893	114.2	254666	4433	9551	1528	14848	408
1928	3698.2	22877	11391	115.2	360398	5289	10517	3625	10778	411
1929	4433.1	28971	11162	107.5	374247	8488	11520	2702	11759	442
1930	4630.5	24658	12248	157.9	482371	9396	9423	3117	14240	463
1931	3637.6	21586	10719	156.9	284256	8201	12660	2485	8501	533
1932	2604.2	15057	9536	142.7	316676	4117	11227	1028	1548	327
1933	2755.5	11209	17626	242.3	456071	2432	11151	701	574	274
1934	2308.4	8515	17649	196.4	259921	6009	10865	593	1103	275
1935	2358.2	4799	18178	152.6	421697	4419	9200	1675	634	236
1936	3765.7	4297	16070	179	698200	/	/	/	/	363
1937	3943.4	2416	16710	108	896680	/	/	/	/	345
1938	1669.3	919	21000	48	664980	/	/	/	/	247
1939	987	2419	12665	47	673560	/	/	/	/	224
1940	1131.9	2540	17702	9	470620	/	/	/	/	166
1941	2020	1996	20962	/	377780	/	/	/	/	/
1942	/	1451	7677	/	229900	/	/	/	/	/
1943	8.4	1173	6887	/	177460	/	/	/	/	/
1944	218.3	1149	4838	56	149880	/	/	/	/	/
1945	232.3	725	4276	47	210340	/	/	/	/	/
1946	/	608	51444	78	314380	/	/	/	/	83
1947	/	1185	20905	42	422500	/	/	/	/	38
1948	/	871	25017	39	/	/	/	/	/	/
1949	/	369	25811	29	/	/	/	/	/	/

注: 1891—1935 年的进出口值和主要商品进出口量均出自甘祠森编《最近四十五年来(1891—1935

年)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 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月刊第三种。并将该刊有关主要说明摘抄如下:

1、本编所用数字皆自海关贸易年刊而来。2、1932 年后, 海关贸易册编制方法改变, 转口洋货不复具

见，因是数字大减。3、海关贸易册自 1932 年始，进口货值改用“金单位”，1933 年起，出口货值改用“国币”。本编为划一计，皆以一金单位合 1.253 关两，一关两合 1.558 国币比例合成关两，以便于比较。

根据上述资料统计，1891 年四川省土货出口总值为 138.96 万关两，而药材出口总值为 34 万关两，所占比例在各种土货出口中为 24.5%，几乎达到四分之一，1892 年川药出口所占比例更是达到了 28.8%，可见川药乃四川土货贸易的大宗，在四川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川药不仅在全省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全国对外贸易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下表为 1903 年重庆出口山货占全国的比重，可见一斑：

四川部分出口山货货值在全国的比重(单位：海关两)^①

货名	重庆	全国	占全国比重
药材	1574514	6966541	23%
木耳	545405	1364741	40%
麝香	685766	855016	80%
五倍子	301994	1316752	23%
大黄	272474	330557	82%
白蜡	209243	307606	68%
桐油	55 万担	170 万担	31%

四川药材在重庆口岸出口的货值为 157 万余关两，占全国 696 余万关两的 23%，甚至在民国 25 年期间，川药出口额（5655540 元）占全国药材出口额（9845453 元）的 57.4%^②。足见四川药材在四川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① 资料来源：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省”。昭和十六年；以及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四川省之桐油》1938 年

^② 资料来源：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1891-1935)年来四川省进出贸易统计》，重庆民生实业经济研究室，1936 年，第 81 页

2. 近代四川药材市场繁荣原因

重庆开埠以来川产药材对省外与对国外贸易量大增，药材市场一度繁荣，探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内外两方面因素，外部因素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拥有丰富的药产种类与产量，其次是现代航运的开通，使得大吨位批量的运输成为可能。内部因素则从农民、药商与政府各方利益集团来考虑。

2.1 自然地理条件^①

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作为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人类的活动。研究政治制度、历史事件及人物思想或许可以轻视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考察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这却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传统社会区域中，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是影响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主导因素。生产地理分工的变化，经济中心的转移，都深受不同自然条件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风俗习惯，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支配。特别是对于本文研究的整个四川药材市场情况，地理环境与气候等自然环境，更是不容忽视。

四川省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几大地貌单元，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是连接西南、西北和华中三大区的天然纽带，地形复杂多样。四川盆地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海拔 300—700 米，四周为海拔 1000—4000 米的山地所环抱。盆地底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区，由成都平原、眉山—峨眉平原组成。其中成都平原面积达 6200 平方公里，是我省最大的平原。龙泉山以东地区为盆地丘陵地貌区，该区地貌条件差异较大，据此又可分为川中方山丘陵、川东平行岭谷区两个地貌亚区。

^① 本节主要参考：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年；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盆地气候具有冬暖、春早、夏热等特点（成都气温会高达摄氏三十三度），夏季普遍长达四至五个月。全年云雾多、日照少，有云雾的阴天每年平均占二百天以上，冬雾尤甚^①。四川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药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川历来为药材的主要产地，境内产药地带，分布颇广。据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在汉晋时代四川药材产地主要有梓潼、汶川、巴三郡^②。元明时代川产药材有所衰落，至清而复盛^③。按全省各种药材的原植物、原动物的习性和分布生态环境，划分为 7 个植被类型产药区^④：

1. 盆地东南缘山区：包括涪陵专区所属长江南岸的绝大部分地区，海拔 500—2250 米。主产黄连（味连）、石香薷、黄柏、苦参、常山、肉独活、蜘蛛香、水蓼本、朱砂和动物药蕲蛇等；

2. 盆地南缘山区：包括宜宾专区所属的长江南岸的绝大部分地区及金沙江流域的个别地区，乐山专区所属岷江下游的少部分地区，海拔 500—1900 米。主产吴茱萸、荔枝核、天麻、石斛、石香薷、旋覆花、大通草、白芨、乌灵参、钩藤、百部、贯众、败酱草、大青叶木香（宜宾防己），常用中草药有半边莲、石枣子、狗爪背、单叶矮砒砒、南天竹（钻石黄）、箭杆风、飞天蜈蚣、还有蝉花、白矾等；

3. 盆地西缘山区：包括绵阳专区的北川县、平武县的部分地区，雅安专区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凉山州的木里县、甘孜州的九龙、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大部分地区，海拔 500—5200 米。主产川牛膝、川贝母、大黄、当归、天麻、膜荚黄芪、南坪细辛、红毛五加、牛尾独活、九眼独活、党参、雪茶；

4. 盆地北缘山区：包括万县、达县专区以及绵阳专区北部的部分地区，海拔 800—2400 米，主要沿秦岭和大巴山南部。主要中草药有黄连、冬花、银耳、当归、湖北贝母、佛手、苍术、厚朴、党参、细辛、山楂、黄柏、味牛膝、回心草、绿升麻、缬草、卫矛、头顶一颗珠、朱砂七、麻布七、黄栌；

5. 盆地中央丘陵平坝区：此区面积最大，为盆地中心，东起奉节、西至雅安，南起合江，北达苍溪，海拔 200—1100 米。如以内江为中心划分东南

^① 王继贵：《四川林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第 443 页

^②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58 页

^③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64 页

^④ 划分参考《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59 页

西北 4 个小区，则内江东部有陈皮、毛化红、枳壳、枳实、青皮、使君子、木瓜、红梅、梔子、丹皮、川楝、巴豆、甜茶、金樱子、香巴戟、铜足灵仙、苦丁茶、隔子通、矮地茶、狗牙瓣等；南部有白姜、姜黄、枳壳、佛手、桂圆、荔枝核、青果、石斛、九节风、辰砂草、巴豆、甜茶及动物药鳘鲡等；西部则是全省主要药材麦冬、川芎、附子、泽泻、白芍、筠姜、红花、川明参、川白蔻、沙疾藜等的生产基地，其他还有紫花地丁、白前胡、威灵仙、三叶红藤、钻地风、苦楝、半边莲、小金钱草、赶山鞭、猪屎豆等；北部有治疗气管炎的芸香草等；

6. 金沙江河谷区：本区除木里县外，包括凉山州和渡口市所属的地区，以及甘孜州的泸定县。该地区主要特点是地形气候变化多样，从低海拔 300 米的金沙江河谷到 4791 米的铧头尖，河谷地带雨量稀少，气候干热，中部以上山区则气候寒冷，雨量充沛。栽培药材主要有苏木、千张纸。最具代表性野生药材是竹叶防风、麻黄、松叶防风、越西木香、草果、草寇、茯苓、独钉子、批麻草、干石斛、红芽大戟、龙胆草、丁铜皮、马尾连、金刚甯、树茄、余甘子、黄芩、泡参、滇紫草、会东藤、普格乌头、小巴豆、拿耙果、昆明山海棠；

7. 高山草原区：此区除九龙、康定县外，包括甘孜州和阿坝州的部分地区，以及凉山州的木里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雀儿山、沙鲁里山和大雪山南部纵贯，以及由这些山脉之间的河流切割，侵蚀程度的差异，形成高原、宽谷、山原与高山峡谷等多种地貌类型，地势高低相差很大，海拔 1300~4200 米，尚有若干超出 5000 米的山峰。此区（2800 米以上）由于历史原因，迄今尚无栽培中草药的习惯，但却是全省野生珍贵药材的主要产区之一，如川贝母，虫草等，其他还有黄芪、羌活、大黄、雪山一支蒿、雪莲花、藜芦、甘松、甘青赛莨菪、狼毒、葶苈子、独一味、白藓皮、多种绿绒蒿、桃儿七墨地及马先蒿属、垂头菊属的一些种。

按品种及种植地区划分，可见下表：

四川药材主要产地表^①

品名	产地	出新期 (月)	产量 (民 21 年/ 斤)	品名	产地	出新期 (月)	产量 (民 21 年/ 斤)
白芷	崇宁遂宁	6	159619	吴萸	宜宾中坝綦江	5	7957
天雄	中坝	5、6	485904	贝母	懋功松潘理番	6	139583
秦艽	灌县中坝建昌	7、8	23853	朱苓	中坝灌县	5、6	9408
天冬	宜宾南川綦江	9、10	10256	小茴	灌县巴县	4	87295
党参	宜宾中坝巫溪	8、9	479024	枳壳	江津綦江	5、6	539835
虫草	懋功松潘理番	4	8228	天麻	宜宾乐山雅安	4、5	26351
麦冬	绵阳	4	153722	白姜	犍为	9、10	408485
杜仲	广元	10	214968	君子	合川铜梁	7	87431
黄芪	灌县	10、11	78491	泽泻	灌县	10、11	189181
粉葛	宜宾	7、8	15106	丹参	中坝	全年	94801
黄姜	犍为	9、10	26351	雄片	彰明	5、6	879893
牙皂	全省	9	5810	牛夕	雅安	10、11	60864
巴米	合江江安	7	18488	佛手片	泸县	6、7	5919
雷丸	南川宜宾	5、6	18488	甘松	乐山宜宾	5	11100
当归	灌县中坝雅安	11	1388930	巴豆	合江江安	7	396764
大黄	汉源	10、11	289076	枳实	江津綦江	5、6	56880
木香	彰明灌县雅安	5、6	43590	赤芍	灌县雅安	6	2490
半夏	全省	4、5	200614	石斛	全省	全年	35905
白芍	渠县中江	6	742677	玉京	崇庆	8、9	88374
黄连	雅安石柱	9、10	13537	红梅	合川铜梁	4	81127
川芎	灌县	4、5	1096419	君米	合川铜梁	7	321323
羌活	灌县中坝松潘	4	244393				

从以上可以看到四川药材的产区分布具有一定的特点。首先是种类多，产量高，分布遍布全省地区。如上表年产上百万的为川芎和当归，其余数十万者有十四种。而且四川全境县市几乎都生产药材，只是数量有区别而已，与全国其他产药材的省区相比，盖没有如此种类与产量丰富且分布广泛的区域与之相比。所以四川素以药材产量丰富、质量上乘而列为全国重要的药材产区。如峨眉桃叶珊瑚为四川所特有，川连、川芎、川贝以其品种出众冠以川字，还有麝香、黄连等全国主要产区。其次，四川药材的主要产区虽集中在丘陵和高原地带，但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的沿江地区。产药品种与产量最丰的县为灌县、中坝、綦江、雅安等，这几个地方也是重要的药材交易市场，这些地方之所以能成为四川最重要的药材交易市场，是由于其本身是重要的

^①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第 313 页

产药区，且交通方便，大都临江有码头，可通行数十吨的货船，且公路交通也便利，我们在后面会有专门的论述。第三，药材生产具有季节性。从上表我们看到，多数药材的生产期为 4、5、6、7 四个月，药材的季节性直接影响到市场交易的周期性，所以药栈的生意这时期也最好。

2.2 水陆路交通情况^①

交通的近代化是经济近代化的必要前提，近代随着四川经济的发展和外国对长江上游交通的开辟，长江航运、现代交通公路甚至航空等现代交通陆续在四川境内出现，使四川的药材贸易更趋繁荣。下面我们就从水路航运、陆路交通与航空来考察。

2.2.1 水路交通情况

一、基本水路网络

四川地区的交通运输以长江及支流木船航运为脉络，与此相联系的是散布在城乡各地的石板小路。长江为主干河流，全域众水归流，汇集于长江，形成一个天然而完整的水道交通网。全川共有大小河流 540 条，总长 4.4 万公里，其中通航河流 90 余条。全川河流除川西北的白河、黑河及达拉沟三条小河北流入黄河外，其他如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乌江等 7 大主要河流以及綦江、赤水河、永宁河、大宁河等均属长江水系。下表是各水系流域面积及流量。

^① 本节资料主要参考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彭通潮、刘方健等《四川近代经济史》。

四川主要支流情况表 1^①

河 名	全长 (公里)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口流量 (立方米/秒)
长江 (四川境内)	897	300, 000	14, 100
金沙江	2, 311	500, 745	4, 920
雅砻江	1, 375	145, 000	1, 810
嘉陵江	1, 120	167, 000	2, 120
涪 江	700	36, 400	572
渠 江	720	39, 200	663
沱 江	507	27, 900	519
岷 江	735	133, 000	2, 850
大渡河	1, 155	92, 000	1, 570
乌 江	1, 018	88, 000	1, 650

长江及其支流 河流以长江为主干，众川或自北以注南、或自南以注北、皆会于长江，大小河流有其名者以数百计，不注入长江者极少。在铁路未修建时，以川江为大动脉。长江位于四川境内计长 897 公里，即从宜宾至巫山楠木园段，此段横贯川南、川东，上接云南、下连湖北、右通黔湘、左达陕甘。长江中小支流木船通航者 29 条，通航里程 2, 234 公里。^②

岷江及其支流 由彭山江口至宜宾通航 277 公里，纵穿川西、川南，全年可通航 50 吨木船。分支流 21 条，通航 1545 公里，其中全年通航 6 条计 613 公里，季节性通航 15 条计 932 公里，可航 10 吨内船筏。岷江流域 30 余州县货物吐纳大部分靠木船，亦为省会对外主要通道。

沱江及其支流 沱江纵穿川西、川南，由赵家渡至泸州 516 公里，全年通航。赵家渡—内江段可行使 40 吨木船，内江—泸州段可行驶 50 吨木船。支流 19 条 974 公里，其中全年通航 10 条 563 公里，行驶 13 吨木船；季节性通航 9 条 411 公里，行驶 5 吨以下木船。沱江流域 17 个州县货物出入运输大部靠木船水运。

嘉陵江及其支流 嘉陵江在川境内由广元至重庆 1, 006 公里，穿川北、川东，支流 5 条 597 公里，均全年通航，是联系陕甘的要道。“以长江支流而言，其水道之繁复、航线之辽阔者，当以嘉陵江为巨擘，盖以渠、涪为之支流，凡川东北繁华城镇，意被网罗，以贯通甘陕，载重四十吨之民船，由涪可以上溯太和镇，由渠可以上溯三汇，由嘉陵可以上溯南充，北道之货，胥

^① 资料来源：四川省交通厅地方交通史志编筹委员会：《四川内河航运史料汇集》，1985 年，79—81 页

^② 参见[日]《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四川省》，1946 年，第 514 页

由是出。”^①

涪江及其支流 涪江纵穿川北、川东，由江油至合州 615 公里，全年通航。支流 14 条 713 公里，全年通航 6 条 378 公里，季节性通航 8 条 335 公里。流域近 30 个州县货物出入运输大部靠木船，以粮、盐、糖、烟、药材、丝茧、棉花、蔬菜、柴等为主。清代涪江有木船 3000 余只，当时太和镇、潼川、遂宁均系相当繁荣的水运码头，常泊船数百艘，来往船工数千人。

渠江及其支流 渠江纵贯川北、川东，由三汇至渠河嘴 446 公里，全年通航 50 吨内木船，支流 13 条计 2003 公里，全年通航 10 条计 1827 公里，行驶 20 吨内木船，其中恩阳河、小通江、前河上游 352 公里枯水时停航，季节性通航 3 条计 176 公里，各河段洪水期均可满载，枯水减 2—5 成。渠江木船运输下行以粮、煤、糖、纸、桐油、药材、蔴、硫磺、木材及农副产品为主，上行以盐、百货为主。

乌江及其支流 乌江在川境内由龚滩至涪州 305 公里，支流 4 条计 183 公里，均全年通航，干流行驶 50 吨内木船，洪水流急浪大，枯水时羊角、武隆等地浅滩尚需搬滩或分段航行，支流行驶 3 吨内小船。乌江木船运输下行主要有粮、煤、桐油、药材、铁、山货、土特产等。上行以盐为主，其次是糖、百货和布匹等。

四川主要支流情况表 2

江河名	起迄地点	干流通航里程 (公里)	支流条数	支流通航里程 (公里)
长江及其支流	宜宾—巫山	897	29	2334
岷江及其支流	彭山江口—宜宾	277	21	1545
沱江及其支流	赵家渡—泸州	516	19	974
嘉陵江及其支流	广元—重庆	1006	5	597
涪江及其支流	江油—合州	615	6	378
渠江及其支流	三汇—渠河嘴	446	13	2003
乌江及其支流	龚滩—涪州	305	4	183
计		4062	97	7914

七大干流通航里程 4062 公里，支流达 97 条，通航里程达 7914 公里，干支流相加达 11976 公里，可见川省具有利用水运的巨大优势。

近代的四川交通主要靠水运，四川的商品进出口基本上靠长江及其支流的木船航运。长江运输干道承运沿途各支流往来的货物，并沟通与中下游的

^① 张肖梅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H 第 4 页

联系。支流嘉陵江、渠江、涪江，“凡川东北繁华城镇，悉被网罗，以贯通甘陕”^①，沱江，通川南“资、简、富、内之货”；岷江通川西“成、灌、嘉、雅之货”；黔江通川东南“酉、秀、黔边之货”^②。四川大大小小的河流成了山货药材出口的主要渠道，是连接药材产地和市场的纽带。长江各流域的货物运输情况基本上能反映药材的产区与输出概况。下表是各个市场水陆交通运输所经过的路线：

药材运输表^③

来地	经过地点
渠县	水道：李渡河—鲜渡河—广安—罗渡溪—渠河嘴—合川—草街子—澄江口—土沱—北涪—瓷器口—相国寺—重庆 陆道：广安—罗渡溪—三汇镇—合川—七八塘—悦来场—头塘—重庆
绵阳	水道：潼川—太和镇—遂宁—野猫溪—东安县—太河坝—安居—合川（后同渠县） 陆道：潼川—射洪—青皮渡—遂宁—塘坝—青木关—高店子—佛图关—两路口—重庆
叙府	水道：泸县—合江—江津—黄沙溪（白木船）
雅安	水道：嘉定—犍为—叙府—（后同叙府） 陆道：仁寿—荣县—牛耳渡—马坊桥—来凤驿—高店子—佛图关—两路口—重庆
广元	水道：三磊坝—石蟆子—苍溪—保宁—南部—顺庆—武胜—合川—（后同渠县） 陆道：三磊坝—潼川—（后同绵阳）
中江	水道：同绵阳 陆道：同绵阳
碧口	水道：姚渡—白水街—三磊坝（后同广元） 陆道：三磊坝—石蟆子—苍溪—保宁（后同广元水道）
灌县	水道：河坝场—赵家场—插耳岩—王渡儿—邓公场—江口—关帝庙—嘉定—叙府（后同雅安） 陆道：成都—牛市口—大面铺—龙泉驿—山顶—石桥—简州—龙泉市—乐至—安岳—青木关（后同绵阳）
中霸	水道：同绵阳 陆道：同绵阳

四川盆地水利资源丰富，发达的水陆交通网为整个药材市场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四川药材业发达的有利基础条件。

二、航运现代化

重庆开埠以前和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出川的货物仍然主要依靠旧式木船运输，船的载重量，最大者为 1600 担，约合 95 吨；最小者载重 200 担，

^① 四川省交通厅地方交通史志编撰委员会：《四川内河航运史料汇集》，1984 年，25 页

^②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民国 28 年，H14 页

^③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民国 28 年，T81 页

约 10 吨重。这一时期重庆长年进出口的船只在二万只左右。

现代化的航运自 1898 年才出现在川江。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开放沙市、重庆为商埠,此后,外商开始对长江上游探险。1898 年枯水期间,英商立德(A. J. Little)的七吨小轮船“利川号”由宜昌溯水而上,由此开启了外轮开辟川江轮运的冒险,1899 年 5 月,英国炮艇“山鸡”号(Woodcock)和“山鸢”号(Woodlarf)到达重庆,6 月英商轮“先行”号(Pioneer)从宜昌出发,用 73 小时航行 400 英里抵重庆。据不完全统计,1898—1911 年 14 年间进入川江的外轮计 26 艘,其中 10 艘为商业性轮船,兵舰 16 艘。^①这些轮舰上驶川江固然是由于经济和军事侵略动机所驱使,但在客观上成为开辟川江轮运的先锋,而且还刺激了民族轮运业的出现。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护理川督赵尔丰在《奏川省设立川江轮船有限公司折》中道:“川省民庶殷繁,物产饶富行人贾客,悉以大江为惯途。而江路奇险天成,节节皆滩,时时致损。……各国商人亦深知此路航业余羨可图,十余年来未能翫置。近日法公司拟办宜渝拖船,经该公司苏梅斯拟定办法,送交税关参酌,复于本年正月由法公使照请外务部咨直到川,是其锐志力营已可概见。奴才外瞻内顾,再三思维,惟有自行设立轮船公司,庶几通航便捷,杜绝觊觎。”^②

这即是以自设公司办法来抵制对外人对川江轮运权的控制。次年 2 月奉旨准行,川江轮船公司宣告成立。公司创办性质为官商合办(官四商六),购置的第一艘船是“蜀通”号拖轮,蜀通轮的运输规模不大,但它的通航开始了川江上商业性客货轮运的新时代。川江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的发展,刺激了四川绅商们对轮船航运业投资的兴趣。加上川江航道的改善,水道、港口的靠岸助航设备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欧洲战事而形成的发展契机,四川轮船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新轮船公司纷纷成立。从民国元年到民国 14 年,全川成立了 14 家轮船公司,拥有大小轮船 24 艘。^③各川江公司的兴起,促进了四川经济发展,并使四川的交通运输条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改善使四川对外贸易量直线上升,药材出口量也

^① 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第 122 页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 年

^② 引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第 42 页,《四川官报》戊申第 2 册,“奏议”

^③ 《四川内河航运史》,第 16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节节攀升。

1891—1947 年四川省土货出口总值及主要商品表^①

出口总值：万关两

年度	土货出口总值	药材（万关两）	五倍子（担）	猪鬃（担）
1891	138.96	34	5876	568
1892	302.11	87	8159	3816
1895	639.67	113	17317	5410
1900	699.30	116	9381	9264
1905	1116.92	183	8699	9213
1910	1549.09	232	13012	14587
1915	1653.72	288	20017	15953
1920	1404.73	243	10452	10388
1925	3274.39	344	54624	14522
1930	4630.45	463	42976	12248
1931	3637.55	533	30773	10719
1935	2358.23	236	40437	18178
1940	1131.91	166	/	17702
1946	232.30	83	/	51444
1947	/	38	/	20905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开埠以后，药材土货出口额度明显增加，药材出口量 1891 年还是 34 万关两，1895 年达 113 万关两，1910 年后增至 232 万关两，这与长江航运的轮船现代化是分不开的。

自轮船航运兴起后，川江交通运输状况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旧有的民间木船运输却遭到很大的威胁。四川在轮船业兴起之前，其运输主要是依靠木船，尤其是重庆至宜昌一段木船数量很大。据海关记载，重庆开埠之初，即光绪十八年（1892 年）全年统计，川江共有木船 1879 只，计 43294 吨。以后逐年有所增长，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达到最高记录，木船在长江有 2908 只，计 100887 吨，^②较之重庆开埠初增加了一倍之多。其原因是，重庆开埠后，贸易量不断增长，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轮船航运并没有正式营业，故而民间木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自宣统元年（1909 年），第一艘商轮“蜀通”号加入长江航线以后，随着轮船业的不断增长，长江干线的木船逐渐被轮船取而代之。到民国 14 年，木船记载仅有一只，20 余吨。当然，这一

^① 数据出自甘祠森编《最近四十五年来（1891—1935）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月刊第三种

^②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八章，航运 25 页，上海，1939

记载不一定准确，但可反映出长江干线民间木船的衰落情况。但由于轮船航运主要分布在重庆至宜昌和重庆至宜宾的长江航运上，中小河流因滩多水浅，轮船对嘉陵江、渠江、岷江、沱江、乌江等中小河流的木船运输影响不大，木船运输仍处在比较兴旺的时期。

2.2.2 公路及铁路运输

一、古代驿道交通

四川多山，所以陆路交通甚为困难，但各种类型的道路仍形成了交通网络。古代主要的陆路为各朝代所修的官道，也叫驿道，官道由官府出资所修，政府紧急公文的递送，行军打仗等军事用途均依靠官道，其余县道、乡道等由民间捐修。

旧时川省地域广阔，所以驿站也多，明末清初共有 200 处之多。

四川驿站分布情况表^①

北路（18 处）	南路（15 处）	东路（24）处	西路（4 处）
锦官驿、广汉驿、汉州站、旌阳驿、罗江驿、新铺驿、金山驿、魏城驿、梓潼驿、上亭站、五连驿、柳池沟站、剑州站、剑门驿、大木树站、昭化驿、问津驿、望云站、神宣驿	黄水河站、五阳驿、来凤驿、百丈驿、名山站、雅安驿、荃经驿、富林驿、泥头驿、化林坪站、沈村驿、泸定桥站、烹坝驿、日地站、打箭炉驿、河南站、越西驿	龙泉驿、阳安驿、南津驿、珠江驿、安仁驿、隆桥驿、峰高驿、东皋驿、来凤驿、白市驿、朝天驿、分水驿、垫江站、梁山站、万县站、云阳站、奉节站、小桥驿、林坎驿、纳溪站、江门驿、永宁驿、善安驿、赤水驿	郫筒驿、灌县驿、映秀湾驿、桃关驿

从川省的驿道交通分布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线以成都为轴心向四方放射，成都宛如车轮之轴，道路由一点而向四面八方成放射状态，分布于成都周围的道路又成环状之配列如出成都东南，越龙泉山脉出盆地，经资阳、内江到重庆，长 1017 里；由成都向东北经德阳、绵阳、梓潼、昭化、广元到陕西，为联系川陕的大路，长 1183 里；南路经荣经越大相岭至清溪（汉源），再北折至泸定，由泸定再向西北 120 里抵打箭炉。第二，盆地

^① (宋)周询：《蜀海众谈》，卷 1，〈驿站〉

周围道路成环状。盆周靠近山地之边缘外，有道路围绕连接成环状。沿盆地东北边为万县、平武间的山麓线，沿西北境者即川北大路。盆地西南、东南两边缘为岷江、长江所环绕，所以成都、宜宾间路线（沿岷江）和宜宾、万县间的路线（沿长江）即环围盆地边的山麓线。第三，河川与道路交织。上游河道除长江干流外，多为南北方向，故陆路交通多以沟通东西为主，与河川的方向多成直交或斜交，除川东大陆的西段略平行于沱江外，都不与河岸并行。因此长江上游水陆交通相辅为用，沟通了整个区域联系网络。

二、公路的兴起与发展^①

四川近代公路交通的出现，是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四川督军兼民政部长胡景伊筹建成都至灌县马路。但由于政局不稳定及地方势力的阻挠，仅从灌县起修了 1 公里左右就停工，以后十余年成灌马路已修的 1 公里公路也渐复为农田，此路虽昙花一现，但仍是四川近代公路修建的开端。到了民国 13 年，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并任四川道路分会名誉会长，拨款数万元赞助修筑成灌路，后又几经周折，民国 14 年冬，成灌路才全线完工，次年开行汽车。此为四川省第一条行驶汽车的公路，长 55 公里，耗资约 20 万元，艰难曲折，历时几年才通车。

以后不久，在四川各驻军防区内，掀起一股修路热潮。自民国 14 年到民国 23 年的近 10 年间，各防区修筑的马路，共 43 条，长 2775 公里^②，从而形成了四川近代公路的基本格局，此间通车的县市有 65 个，为民国 24 年四川省行政区划 170 个县市局（包括西康在内）的 38.2%。通车的县市计有：成都、华阳、郫县、灌县、简阳、资阳、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璧山、巴县、重庆、新都、金堂、中江、三台、盐亭、南部、阆中、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彭山、眉山、夹江、乐山、新繁、彭县、温江、崇庆、大邑、广汉、德阳、罗江、绵阳、乐至、遂宁、蓬溪、南充、岳池、广安、渠县、万县、西充、潼南、合川、铜梁、安岳、彰明、大足、安县、绵竹、富顺、峨眉、犍为、威远、叙永、什邡、蒲江等。^③可以看到，四川盆地周围，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基本通有公路，而贫瘠的地区因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限

^① 本小节参考彭通潮：《四川近代经济史》，西南财大出版社，2000；“四川公路大事记”，四川交通厅公路局，引自“巴蜀网”

^② 《四川公路大事记》，四川交通厅公路局

^③ 四川省交通厅史志编委会编：《四川公路交通史》（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70 页

制，无法集资修建公路。

民国 22 年，刘湘战胜刘文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基本结束，统一全川的局势开始形成。民国 22 年冬，四川公路总局组建，此后对全省的公路标准，建设及维修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规划，进一步推动了四川公路建设的发展。民国 24 年开始，省际间的四大干线，川黔路、川陕路、川湘路、川鄂路，逐渐修建通车，至此，近代化的公路交通网逐渐成型，一直沿用到今天，比如作者曾经走过的“318”国道，宜昌至万州一段就为旧时公路基础上建成。

省级公路表^①

省际干线	通车时间	经过市县	全长(公里)
川黔路	民国 24 年 6 月	成都、简阳、资阳、资中、 内江、隆昌、荣昌、永川、 璧山、重庆、綦江	640
川陕路	民国 26 年 6 月	成都、新都、广汉、德阳、 罗江、绵阳、梓潼、剑阁、 昭化、广元	413
川湘路	民国 25 年 1 月	綦江、南川、白马、彭水、 黔江、酉阳、秀山、茶洞	698
川鄂路	民国 26 年 1 月	简阳、资阳、乐至、蓬溪、 南充、岳池、广安、渠县、 大竹、梁山、万县、利川	800

三、铁路运输

四川的铁路事业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伴随着帝国主义激烈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开始的。外国资本势力进入上游的一个巨大困难就是封闭的地理环境，这促使他们利用扩张势力最有效的工具——修筑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英国人达威斯《滇缅铁路报告》说：“吾等几难深信处于云南之邻近，尚有一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之省份——四川。故任何铁道之设计之最终目的，不仅鼓励经缅甸边境局部之贸易，且须获得由印度到达四川及中国东部之经过线方向。”^②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年，英、法、俄、美、德等国，提出了在四川建筑四条重要铁路的计划^③：

(1) 英国拟将滇缅铁路延长至重庆、成都；

^① 该表根据《四川公路交通史》编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②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 466 页，中华书局，1963 年

^③ 四川省交通厅史志编委会编：《四川公路交通史》（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71 页

- (2) 法国拟将滇越铁路延长至成都、重庆；
- (3) 英国拟筑川藏铁路（由今昌都经康定而至成都，重庆）；
- (4) 英、法、美、俄、德等国，强索川汉铁路。

1903年4月锡良被授任四川总督，7月便上奏清廷请设川汉铁路公司，自办铁路。1904年1月在成都设立了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川汉铁路公司从1907年动工修铁路，但因在修建路段上先后意见不一致，致使工程进度十分缓慢，直到辛亥革命时，宜万段只修成30多华里。截止民国26年，北川公司修成窄轨铁路共16.8公里，路经白庙子、水岚垭、麻柳湾、文星场、后峰岩、郑家湾、土地垭、戴家沟、大岩湾、大田坎等地，有车站11个，职工210人^①。

铁路在四川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且是与帝国主义争夺矿权挂钩，修成的路段也主要是以运输煤矿为主，对于药材土货的运输与出口，大多依靠水路运输与陆路交通，并没有用到铁路。事实上至民国后期，药材种植与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市场逐渐萎缩，我们在后面会有叙述。

2.3 市场内部组成要素分析

2.3.1 药材生产者——农民的利益最大化

历史上，四川素以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而闻名全国。在康熙时，“蜀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②，可见当时四川农业发展条件之好。但乾嘉以后，除四川的少数边远山区外，平原好田好地基本被垦辟完毕，若再要扩大耕地面积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和资金，困难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四川人口却迅速增加。

^①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1058页，中华书局，1963年

^② 康熙《清实录》，卷36，7页

清人口增长表^①

四川人口总数 (万)	起讫时间	大约所用时 间(年)	年增加人数 (万)
50—1000	1661—1784	123	8
1000—2000	1785—1812	27	37
2000—3000	1813—1860	47	21
3000—4000	1861—1898	37	27

一方面，人口迅速增加，而耕地面积则基本不变，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

年代	册载耕地面积 (万亩)	册载人口数 (万人)	人均耕地(亩)
乾隆 18 年(1753)	4595.7	136.9	33.56
乾隆 36 年(1766)	4600.7	306.8	14.99
嘉庆 17 年(1812)	4697.9	2070.9	2.27
咸丰元年(1851)	4638.2	4475.2	1.04
同治 12 年(1873)	4538.3	5834.4	0.79
光绪 13 年(1887)	4641.7	7317.9	0.63
光绪 23 年(1897)	4706.2	8378.0	0.56

资料来源：耕地统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60 页；人口统计同上表

而根据民国 29 年，中国农民银行对乐山、温江、绵阳、射洪、南充、内江、宜宾、巴县、万县和安县 408 家农户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作过的调查统计，其产量如下：

四川主要粮食产量表^②

品名	年份	民 29 年	平 常 年	丰收年
	农户类别			
稻谷 (市石)	自耕农平均产量	2.94	3.41	3.89
	佃农平均产量	2.95	3.47	3.90
小麦 (市石)	自耕农平均产量	0.23	0.76	0.98
	佃农平均产量	0.70	0.89	0.99
玉米 (市石)	自耕农平均产量	1.16	1.28	1.61
	佃农平均产量	1.22	1.27	1.53
甜薯 (市担)	自耕农平均产量	5.41	5.71	7.34
	佃农平均产量	4.50	5.41	6.67

① 资料来源：严中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附录<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科学出版社，1955 年

② 资料来源：中国农民银行编《四川省经济调查报告》，民 29 年，第 131 页

若根据当时稻谷每石折合 350 市斤，小麦、玉米每石折合 350 市斤，甜薯每担折合 100 斤计算^①，则粮食亩产量则为：

品名	年份	民 29 年	平 常 年	丰收年
	农户类别			
稻谷(斤)	自耕农平均产量	735.0	852.5	972.5
	佃农平均产量	737.5	867.5	975.0
小麦(斤)	自耕农平均产量	80.5	266.0	343.0
	佃农平均产量	245.0	381.5	346.5
玉米(斤)	自耕农平均产量	406.0	448.0	563.5
	佃农平均产量	427.0	444.5	535.5
甜薯(斤)	自耕农平均产量	541.0	571.0	734.0
	佃农平均产量	450.0	541.0	667.0

上表涉及了四川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调查方法也比较科学，统计、计算口径大体一致，其可信程度是较大的。尽管资料是统计于 30、40 年代，若考虑到近代四川农业生产力在近百年中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所以仍可当作衡量的标准。

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自耕农户，按人均耕地计算，则一年的粮食产量为（假设栽种稻谷） $0.56 \times 3 \times 852.5 = 1432.2$ 斤，尚且勉强维持生计。而农民收入一大部分要缴纳赋税，民国以来，四川农民的赋税有增无减，如成都地区，1902 年每亩稻田的赋税不过 0.4 元，到 1928 年时，每亩稻田的赋税高达 2.56 元，比 1902 年增长了 6.4 倍^②。正税加上附加的苛税，农民负担极其严重，如在刘湘防区“农民每种一斗田，除纳正税 6 元外，另征军费 30 元，附加税 20 元，临时派款 10 元，烟亩税捐 6.2 元，团费 6.5 元，共 70 余元，而各区乡镇及保甲亦从中趁机剥削，挨次附加，有的一斗粮竟缴至 90 余元或 100 余元者。查一斗田，丰年只能收谷 20 石，以市价论，每石售洋 6 元，附缴捐税外，所得甚少，如遇歉年则不足以供榨取。”^③农民捐税繁重，导致农民生活困难，负载累累，据中国银行 1933 年对四川 1556 家农民调查，四川农民负债面高达 61%，在耕种 30 亩以下的农民中，负债率平均为 62%，耕种 30

^① 折合比例参见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13 章 6 节，商务印书馆，民 28 年

^② 李作周：《中国底田赋与农民》，载《新创造》1932 年 7 月，21 卷，1—2 期

^③ 许涤新：《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载《中国农村问题》，1936 年，50 页

亩以上农民中，负债率平均为 25%。从负债原因看，因粮食不足而负债者占 54%，因缴付赋税而负债者达 75%，农民每年所得，除付债外，所余无几。^①

大量的赋税与债务致使农民从各方面寻求出路，种植副业就是其中之一，正如费孝通所指出：“如果农用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②就当时的四川农村而言，单纯的农耕利润已不敷农家赋税与支出，副业已成为农民维持生计的重要支撑。

清代的商品性的农业副业形式广泛，主要是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包括蚕桑、棉、麻、甘蔗、药材等经济作物。这种方式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而在四川，除比较普遍的种麻织布、栽桑养蚕、植桐榨油等副业外，种药采药也是四川农业中重要的副业，不少农民甚至赖此为生。明代开始，四川就有栽培药材的记录，洪武年间（1368~1398 年），石柱县开始栽种黄连，黄水苍坪陶姓人家，将深山发现的几颗野连移回栽植，并因此致富，后来黄连栽培技术普及，黄连生产不断发展，到民国时期，种黄连农户已达 4200 余户，其中有 6 户栽连面积多达 40 万棚。种连范围发展至石家坝、鱼鉴口、桥头镇、黄水镇、悦来镇、湖镇、新场等，其中以黄水、悦来 2 镇为重点，常年产量 3.5 万公斤，最高年产量可达 5 万公斤^③。清康熙年间，绵阳开始试种麦冬。起初只有 4 户人家将野生麦冬移作家种，结果发现家种麦冬不仅肥润质优，产量亦高，于是种植人家逐渐增多，1936 年，家种面积为 1400 亩，总产量高达 4.04 万斤^④。

药材的种植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大大活跃了四川的农村经济。四川是个农业大省，工商业不甚发达，农产品种植多以水稻、小麦为主，因此除纯粹药农外，普通农民将种植药材作为农村副业，通过出卖药材增加收入，如彰明“农工业俱不发达，人民自奉菲薄，差可勉维生计。惟县中特产附子年收获三四百万斤，如遇市价高涨之年，农村生活，比较充裕。”^⑤又如崇庆通议乡“农民以利厚种芎，近岁闻风竞逐，

^①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正中书局，1936 年，第 455 页

^② 费孝通：《九访江村》，《费孝通学术精华录》，第 1 辑，北师大出版社，1988 年

^③ 参见明《食物本草》卷二，《四川省志 医药卫生志》，1991 年，第 395 页

^④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正中书局，1936 年，第 455 页

^⑤ 同治《彰明县志》，卷 57，44 页

商贾起家置良田沃产者踵接。”^①可见药材种植在合理分配农村劳动力的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符合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2.3.2 市场的组织者——药商的选择

商业发展过程中，贩运是各类商业活动的基础，贩运商是从商人员的主体。商贩活动的活跃程度直接影响到整个商业环节的兴衰。各类商贩由于路途遥远、活动周期长，一次贩运可能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这些商贩往往组成各类帮派团伙，也就是“商帮”。药帮也是商帮的一种，这种组织形式是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与其他行业的商帮一起发展起来的。

一、药业经营组织的发展

明末清初，四川中药商业的不断发展，使得省内省外的药商陆续组织起来，建立行会，形成药材帮口（药帮）。省外在重庆开设字号的首推江西药商“德记”药材字号，这时四川最早出现的药业组织形式，它雇用四川人充当其职员和学徒。“接着便有怀帮（河南）、浙帮（浙江）、广帮（广东）、湘潭帮（湖南）、申帮（江苏）、碧口帮（甘肃）、汉口帮（湖北）等以及省内的雅州帮（雅安）、渠江帮（渠县）、叙府帮（宜宾）、灌县帮（灌县）、绵州帮（绵阳）、中坝帮（江油）、广元帮（广元）、中江帮（中江）等，相继在重庆开设药行。”^②足见药材市场之发达。民国时期，药帮组织已遍及全省，并逐步改组成药业公会（亦称“国药业同业公会”），以重庆、成都、万县、中坝、宜宾、灌县、雅安等几个较大的药材集散地的药业公会规模较大人员较多，业务活动也较频繁。

这种药业公会是药商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行会组织，其内部制定有规章制度，摊派捐税，甚至可以行使处罚，不过总的来说，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形式。“药帮成立之初，只需送一副对联，一万头鞭炮及一对大烛，即可成为会员。”^③光绪三十年（1906年），随着药材商业的发展，要求入帮的人增多，入帮条件相应改变：“先要有一家药商介绍和担保，并交纳会费（即帮捐），生药号的帮捐为两锭银子，才能领到一个牌照（即会员证），方可开始营业。

^① 民国《崇庆县志》，谢汝霖修，巴蜀书社，1992年，第327页

^②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4页

^③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5页

此后，如果会员更换自己招牌上的一个字，则要交帮捐三两银子。”^①

1931年重庆药材同业公会改组，改组之后的公会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改除陋习，使之更适应形势。比如废除银规、改革交单、取缔介绍业。同时成立励商通讯社，并根据成交联单统计药材交易数量及价值^②。1941年国民政府又颁行商会法，规定以经营输出业务为主的同业公会，应改称为“输出业同业公会”，于是又改为重庆药材输出业同业公会。并“依据输出业同业公会及输出业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订立了公会章程，提出“以谋输出业之改良发展及矫正同业之弊害为宗旨”^③，为挽救走入衰退的四川药材贸易作出了大量的工作。

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四川药材业商业已经非常发达，经营组织也通过专业分工，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四川药材经营组织大致可以分为字号、行栈、铺户三类。

1. 字号：字号即运销商，是整个业务最重要的部门，主要经营大宗药材品种的贩运，整进整出，将西南、西北的山土药材输出，复将省外和国外的洋广药材（如洋参、安桂、乳香、没药、玄胡、细辛、杭菊等）输入。字号又分土药和广药两种字号：土药字号以贩卖山土药材两种业务；广药字号以买土药，卖广药为业务^④。人员视其规模大小，一般大型者约20—30人，中型者10人，小型者较少，仅1—2人。

在交通极端闭塞的岁月，字号要得到信息，进行业务联系，全靠“帮信”。职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快递，不过业务范围相当有限，由专人跑专门地方，比如重庆跑湖北是一人，跑贵州、云南则另有其人。每月收发信件，十天一次，如有紧急重要信息，帮信派员跑专信，其代价视路程远近而定，到达后以纹银作报酬。鉴于当时交通以水路及官驿为主，十天一次信息更新，已是非常之迅速的，“帮信”所带的信息，一般是各地药材收成如何、物价如何、市场需求等等有用信息，可见药材商人对信息收集的重视程度。

2. 行栈：行栈在清代时称“牙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间商。牙行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

^①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

^②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T66页

^③ 《山货业与药材业近况》，《四川月报》，第1卷2期，1941年

^④ 周汶：《古今药都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

间行商，是一古老的行当。汉代称驢、驢侏，唐、五代称牙、牙郎、牙侏，宋、元、明又有经纪、行老等称呼^①，牙行一词始见于明代。他们以经营牲畜、农产品和丝绸布匹等手工业品为主；也有居间包揽水运雇船的，称埠头。清雍正十一年(1733)，鉴于牙行太多，影响商品流通，改行额定牙帖制度，经各省确定全国牙帖总数约 18 万张，并规定以后只能“退帖顶补”^②。牙行须有“部贴”才能开业，部贴即请帖，就是立案请领营业执照之意，凡向厘金局领取部贴，须交纹银 48 两的请帖金（申请税）^③。部贴可以顶证出租或出卖，是一种居间商性质，即居于买卖双方间，为药材批发交易服务的一种业务形式。

行栈又分广药行栈、土药行栈和零售土药行栈 3 种。顾名思义广药行栈专营介绍进口药，土药行栈专营介绍出口的土药，零售土药行栈则零售土药。但 3 种行栈的人员来源基本相同：多是药帮中失业的学徒、店员，或药号倒闭失业的老板充任。行栈的主要任务是住宿药材商人，包装、运输或堆存客货药材，介绍生意并从中抽取佣金。

交易时，买卖双方不直接见面，由行栈从中周璇，而行栈人员一般只顾卖方，故当时有所谓“有货才有客”的说法^④。但对买方也要兼顾，总之行栈要双方讨好，业务才好。有的买方或卖方，有时不来人，只来信，委托行栈帮买或帮卖。行栈一旦收到书信或药材后，就按照先商定好的价格进行买或卖，其价格超出部分全归行栈。行栈对于卖方的货，当着自己的财产一样爱惜和保管；如一时卖不完，行栈还要雇人进行翻晒、熏烤等，所花费用则由卖方付给（先由行栈垫付，待货卖完后再一并结算）^⑤。同时行栈经常与卖方联系，如药材开始发霉、生虫等，行栈便立即去信告诉卖方催促早卖，以免损失亏本。

这个买卖过程中间，存在一定的信用问题，由于过去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如签订合同），行栈与买家、卖家间的代买或者代卖行为，全凭买家、卖家或者行栈的信用程度，所以，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问题，如

^① 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 年，第 150 页

^② 清《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清《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年，T68 页

^⑤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16 页

买方托行栈买入药材，由于某些原因并未取，那么行栈会先放置一段时间，其间还得出钱雇人不断翻新药材，如果一个月之后买主失约，则行栈必须自行处理药材，行栈损失的不仅是维护药材的费用，还要承担此单药材的市场风险，对于行栈来说，其经营规模不大，投入的周转资金不会很多，此种情况发生频繁的话，行栈便会因为资金周转问题而运营陷入困境。所以，行栈需要经常与卖方联系，如药材开始发霉、生虫等，行栈便立即去信告诉卖方催促早卖，以免损失亏本。

3. 铺户：铺户即择药铺，是居于字号和咀片铺之间，进行药材批发（整件进，分零卖出）的一种业务形式。它进货后，不是将药材原封不动地销售出去，而是在出售前进行一次细致的挑选和分等级工作，故称择药铺。即将购进的药材，通过筛灰、去皮、除杂和拭尘等方法，达到保持药物干净纯粹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再分销城市、乡村的两个等级市场。由于经营性质不同，又可分成为择药铺（即生药铺，系转售性质，转售生药给熟药铺）、咀片铺（即熟药铺，系直接出售熟药者）、草药铺（专卖各种草药）、烧房（专炕云皮、橘皮和橘络）和包袱客（系专办一种药材者）五种^①。

铺户药材来源主要通过行栈介绍，向字号购进洋广药材和山土药材，其比重约占进货总量的 80%^②，其他则是收购邻近农民培植或采集野生的，以及小药贩从附近各地贩运的小宗品种，如吊兰、荆芥、薄荷、紫苏、麦芽等，这些仅占铺户进货总量的 20%^③。其销售对象，首先是当地咀片铺，约占销售总量的 30%，其次是邻近各地的咀片铺，占销售总量的 70%。铺户的销售数量比较零星，三五斤，十几斤都卖，但“卖斤不卖两”是与咀片铺的重要区别。如本铺品种不齐，必找同业“配缺”，以照顾与保持买方长久的往来关系。据民国五年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铺户 3214 家^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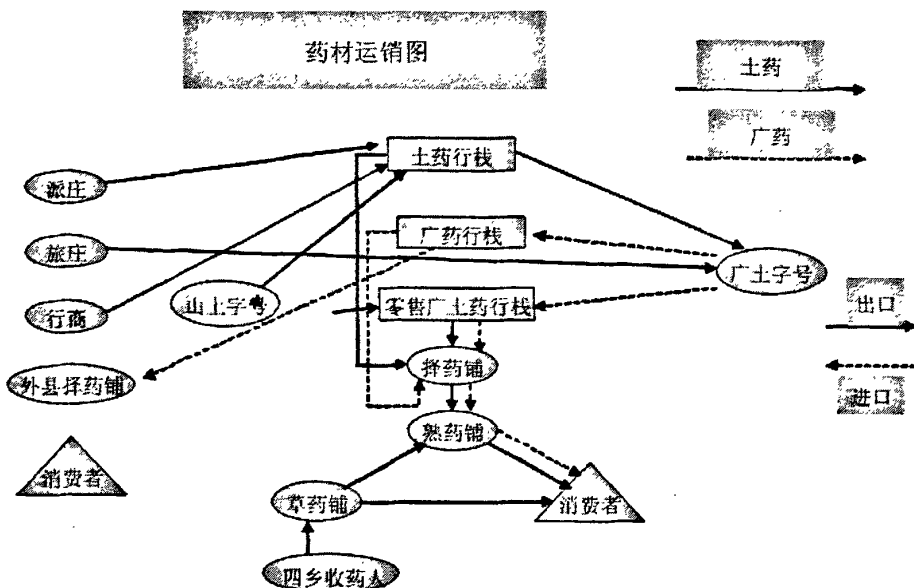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年，T70 页

^② 《四川药材业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四川委员会编，3 页

^③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年，T70 页

^④ 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民国 35 年，第 379 页

下表是整个药材行业的运销图：



二、交易方式

行栈与铺户经营药材业的方法，可分为吸收货品与交易货品两种方法。

1、吸收货品。按经营者性质不同，其吸收货品的方法有三种。广土字号一般在产地设庄收买货品；山土字号则在产场和销场都设庄，收买货品；行栈则附带在产场设庄，收买货品^①。

2、交易货品。交易分产场与销场的交易及销场与销场的交易两种。前者属于代售性质——亦即间接介绍，后者属于直售性质——亦即直接介绍。其方法及分别如下：代售性质的，产场以信函通知销场，委托代售货品。销场斟酌行情，代为售出，或自行买卖，但必须由行栈经手。直售性质的，购入或售出，全由专门经营中介者经手代办。如在重庆“中介每日上午往各家字号赶场报盘，十二点后，在三牌坊正泰隆隔壁茶社及松柏长茶社^②，探听行情，夜间也去。所有交易，悉由此中产生”^③。

经营药材业，一般对于出口贸易，有五点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考察外省销市情形，存货“过脚”与否（过脚即存在底拖空之意）；其次考察产场与

^① 杨显东，谭炳杰：《四川省之药材》，《农业丛刊》第24号，第24期，1941年8月，第44页

^② 指重庆地区。

^③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69页

去年比较的生产量；第三考察外省同样产品的生产量；根据渝埠存底多寡，推测省外销市的旺淡；最后根据途中来货多寡，推测省外销市的旺淡。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药材经营者并不仅仅限于经营药材买卖，多兼营山货，如羊毛、倍子、耳子、白蜡、芋片等，经营的数量比专营的山货帮要多，经营的方法与经营药材无异。

庄客在外山收买药材，按交易情形，可分三种方法：首先是帖条招贩。如果庄客不谙悉当地情形，到当地后即帖条招售贩子，命贩子采办药材，自己则可就地休息，交货时照市价付款，此方法的前提是庄客要对当地药材行情非常了解才不会吃亏，所以采取此方法的较少。其次由称杆子介绍。外山药材经纪人，名为“称杆子”，专为庄客介绍买货。手续先看货样，交易若成，即交定银若干；收货后，再付足货款。第三是先银后货。采用这种方法的多是买卖双方彼此熟悉的，庄客之前定货样，先期交银，买方持银往各处收货，如期交给。此种交易，如货品尚未交到，遇市价突涨，卖方则只照市价交货，所以纠纷也时有发生^①。

庄客收买的药材除为贩子直接供给外，多由“称杆子”介绍，但也有为当地药店介绍的。在渝市上，凡山土字号，或药业行商，贩运来渝的山土各货，规定应由药材行栈经手介售，不得向受货人直接出售，也不得由非行栈经手介售^②。也就是说，销售这一渠道由行栈垄断。这就保障了行栈的地位和其作用。行栈经售的手续如下：

1、看货议价。行栈介绍售货人，看货或在行栈，或在山土字号、广土药材字号当面看货议价。药材同业工会对看货议价程序有如下规定：

(1) 货品授受：一律退皮计净值^③，不得强制退换；

(2) 货品交易：一律以净质为原则；如货品重混合有他质者，受货人应甄别提退；

(3) 货品中以两计值者，一律以关称、关平为准则，由工会置备公码为权重标准；秤端置针^④以定平旺；

^① 阮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

^② 《四川药材业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3页

^③ 注一：退皮有三种。画皮——完全除去；例皮——照皮重除五斤；滚皮——连皮计算在内。

^④ 注二：药材衡重，系以药帮自制天平秤，一百五十八两为十斤“但每种药于权重时，又须照天平各打一种折扣，是为称规”。仅麝香一种系用官秤论换。

- (4) 货品重量，经秤权准后，不得擅加折扣；
- (5) 同业交易，概以国币（银元）为本位，照价值以九五扣兑；
- (6) 凡药材行栈介绍交易，向卖方以九七扣取佣金。

2、成交。货品成交时须用公会制发的四联交单，一方交买方，一交卖方，一交公会存查，一留行栈存根。货品一经成交，山土字号则与行栈为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如收货人发生倒闭等事，与售货者无关。所以行栈有谚语：“三分易得，九五难赔”^①。公会对成交程序规定如下：

- (1) 买卖双方授受交单后如遇货价涨跌，买卖双方不得借故退盘；
- (2) 凡成盘的货品其中有不符原样的，须经经手药材行栈及买卖双方，到场验看^②；
- (3) 凡货品授受，均售方制订簿记，向受方即日盖印为凭^③；
- (4) 收货人将货物的皮及他质退出后，即由经手药材行栈转退售货人，置立退皮盖印簿，由售货人盖印为凭；
- (5) 成交货品应退包皮，最迟不能超过二十日；其有水渍霉烂应退者，须由经手药材行栈及授受双方到场验退；
- (6) 凡货品经药材行栈介绍成交，不即日起发，如遇天灾世变为人力所不及保护，致遭损失者的三日以内为卖方负责，三日之外归买方负责；

3、发货。行栈发货有由行栈径直发往买方的，有由行栈通知卖方，由其直接发买方的。公会对发货的要求有两点：

- (1) 行栈发货时由行栈出具发货票。其票上著名货品、件数、重量、日期，交与售货人，以便照票收货。对于售货人方面，出具代售票，注明货品、件数、重量、日期，交与售货人存查；
- (2) 凡买方发货于药材行栈售货者，运输费归卖方付给；买方向药材行栈买货者，运输费归买方付给；

4、交兑货款。交款以一月为限，分两期交付。如初十以前交易的货款，月半付半数，月底付清；二十五日以前交易的货款，月底付半数，下月半付

^①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73 页

^②注一：药材劣货之点：搅沙、发水、退灰、杂以他货、风霉、水渍，凡遇此货，均可作退，由售货中扣足款数。

^③注二：卖方于发货后，须将簿记（盖印簿）送交行栈盖印，再由行栈送买方盖印，作收到货物的证据

清。但收款人须于到期前三日通知付款人，到期兑款。交付款后，须由收款人盖章或出具收条为凭。下表是标准的药材交易收据表：

交易药材收据表^①

联 一 第		联 二 第		联 三 第		联 三 第	
根 存 棧 行		查 存 会 公 交		方 卖 交		方 买 交	
民国 字第	设定每百斤实价银元	民国 字第	品 货 数 件	民国 字第	设定 每百斤实价银元	民国 字第	设定 每百斤实价银元
年	(号 号)	年 月 日	照价每 规银百 圆斤 算实	年	宝号照	年	宝号照
号 月	号 买 号 买	号	人货街	号 月	算	号 月	算
日	算照规	号	人货买	日	(号 买)	日	(号 买)
		号	介绍手 经		盖章		盖章
制会公业同材药市庆重		制会公业同材药市庆重		制会公业同材药市庆重		制会公业同材药市庆重	

从上面的收据可以看到，收据并非随意由商家自行开出，而是统一的由重庆市药材同业公会印制，而且还要留一份交公会留底，方便查存。可见药材公会对药材交易的规范化约束。

2.3.3 市场的监管者——政府行为分析

就药材市场而言，政府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它制定相关的制度，设立相应的卫生行政机构实行监控和管理，促进药材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药材业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税收，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民国后期，政府针对药材业的苛税不断增加，以致于后来成为扼杀四川药材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下政府的各种行为^②。

一、卫生行政机构与医事制度的沿革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66
^② 这里主要指政府对药材业的监控与改良，税收方面后面有叙述

药材业的兴衰与中国历代政府的医事制度分不开。我国周朝起就设有医药行政管理机构,秦汉以后逐渐发展完善。元朝建省后,地方设官医提举司和医学提举司。官医提举司管理医户的差役及诉讼等事务(相当于现今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明朝时期地方置医官,称“医学”,管理卫生行政和医学教育事宜。府置正科、州典科、县训科,皆不给禄。明朝洪武年间在高县、南川等县设立“医学”,并由礼部发给医学记铜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设四川盐井卫军民指挥司医学^①。永乐四年(1406年),设四川天全六藩招讨医学,以当地人钟铭为典科^②。永乐九年,设四川永宁宣抚司、九姓长官司医学^③。宣德十年(1435年),设四川都司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医学^④。正统十三年(1448年),设四川马湖府沐川长官医学,置训科一员。成化三年(1467年),设四川资阳县医学等^⑤。清沿明制,府州县亦设医学。乾隆年间,四川官署设医学的有:府8所、州1所、县110所,全省除酉阳宣慰司、叙永厅、永宁、雷波卫、越西卫、德昌所、清溪、打箭炉外,均设医学,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⑥。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川内形成了基本上覆盖全省比较完善的医学体系。

北宋时期,政府还设置了官营药局。所谓“官药局”,是指由国家开办、管理和经营的药物贸易机构,因其创立的目的在于施惠于民,因此也称为“惠民药局”。惠民药局制度创立于北宋,因宋代对医药事业最为重视。清朝曾有言“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有意”^⑦。在“以医药实行仁政”的治国思想下,北宋朝廷不仅对本草文献和民间药物经验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整理和总结,同时还创建了第一所国营性质的药局。经过北宋、南宋、元朝与明朝的发展,最终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和私营药材商业的发展而衰落下去^⑧。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日趋腐败,医药管理机构及原有制度渐多废弛,地方医官任用制度亦逐渐被废弃。四川各地设有医药机构的仅有成都府、顺

^①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326页

^②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327页

^③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5页

^④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6页

^⑤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6页

^⑥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6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三,医家类,转引自史继刚:《宋代药局建设与药品经营管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⑧ 关于官药局“惠民药局”可参考史继刚:《宋代药局建设与药品经营管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以及靳秀梅:《宋元明清药肆初探》,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6月

庆府、广安州、巴州、剑州、城口厅、越西厅、什邡县、德阳县、古宋县、广元县、大足县、南部县、简阳县、崇宁县、梁山县、荣经县、江油县、彭山县、江安县、屏山县、高县等 20 多个地区^①。地方医学已经一蹶不振，医政事宜多无人过问。

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实施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4 年），中央增设巡警部，光绪三十年，巡警部警保司下设立卫生科，使独立的卫生行政归由警察部门管理。光绪三十三年，四川警察总局改名警务公所，所内分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 4 科。卫生科设科长、副科长、检查员、医务员各 1 人。卫生科管理“清道、防疫、检查食物、屠宰、考验医务医科及官立医院”等事项。宣统二年（1910 年），卫生科下添设检察、医务两股。检察股管理一切有伤生理之防杜事项及整洁道路，排除积秽，统辖卫生队；医务股管理病院之一切诊案事项，研究医务改良及考核医药^②。

清末警察总局成立后，全省各地的警察机构随即纷纷建立。成都、重庆、自贡设市后，于警察局内设卫生科，同时市府内亦设有卫生科或卫生股，共同管理各市卫生行政事宜。各县之卫生行政，则由县府主管民政的第一科兼管，并由县警察局或警佐室兼办公共卫生事务。其职责为：规划全省卫生事业，筹设及指导公共卫生机关，审核各县市卫生经费，监督中西医院，管理中西药商，审查医务人员，调查、预防疾病，管理公墓等事项。这样多的事务只设一名科员主管，自然上述规定只有徒托空谈。

辛亥革命以后 20 余年，四川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经济文化均遭破坏，卫生事业停滞不前。到抗战爆发后，沦陷区一些医疗单位及卫生人员迁入四川，同时，民国政府由南京迁重庆，四川成为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为了社会及军事医疗的需要，民国 27 年 5 月，在省民政厅内成立“四川省卫生委员会”，统筹全川卫生事宜。民国 28 年，为“应付空袭救护燃眉之急”，四川省政府于 5 月 16 日成立四川省卫生实验处，隶属民政厅，处内设总务科、医政科及技术室，工作人员共 35 人^③。从民国的医药机构与人员设置可以看到，政府已经从重视中医中药转变为重视西医西药，开始沿用西方的医药卫生制

^①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35 页

^②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36 页

^③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36 页

度与机构设置，中医与中药成为辅助的环节，或者说，中医逐渐走向没落了。

二、政府对于药材行业的改良^①

近代随着列强打开国门，西医与西药开始传入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文化及西方医药学在我国进一步传播，这对我国的社会及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之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是总的来说民国时期政府对中医持扶持态度。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随着中医学校的建立，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运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这些中药讲义，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

2、药学辞典类大型工具书的出现，是民国时期本草学中的一件大事。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者，当推民国 24 年陈存仁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学辞书。

3、本草学的现代研究开始起步，植物学、生物学工作者对确定中药品种及资料调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多药学工作者则致力于中药化学及药理学研究。

随着列强入侵，西方各国也对中医药学产生兴趣，“……如国际联盟会内之国际保健委员会特组织一汉法药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我国药物与治病方剂，认为世界最宝贵之珍品……”，又如“……美国农部因有几种植物科学家研究不出他的性质和能力，我们本草上所记载，却非常详明，实验起来，更非常靠得住，因而对于中国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一类的书特别注意，派专员从事研究，和实行实地试验。……又据旧金山报载沿太平洋海岸中国药材及奇效医术，日渐推广，美人所付中国药材之费已达数十万元之巨，……苏俄方面已已由苏俄健康委员会医药会议议决成立东方药物研究会，亚洛尔科索柏鲁特等名家均参加研究”，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也不甘落后，“……日本为复兴皇汉医药运动之最早者，设有国立皇汉医方研究所，并制定汉方医术开业试验法，所出汉药书记及杂志已有数十种，即我国之植物学大辞典亦多取材于彼”^②。各国对中医药的研究使民国政府认识到川药的重要，四川省政府下属的生产计划委员会遂针对四川药材业进行整顿与改革，以期“一、改

^① 本节主要参考《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编制，民国 29 年

^②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 10 月

进川省特产药品以利外销；二、试种抗战必需药品以谋自给；三、利用荒芜边境推广药材生产。”根据这三大目标，具体措施为^①：

1. 培育药材品种。首先在灌县成立药材试验总场，搜集四川现有药种作品种比较试验，对各种品种有初步的观察，“籍作判别优劣之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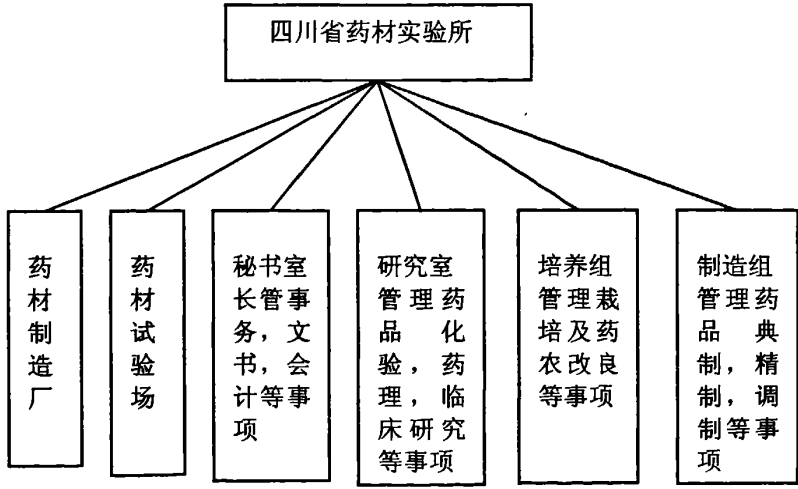
2. 提制生药。在灌县成立制药厂，任务是对中药“已被西药采用或已被科学家研究出之有效要素与制者应宜提制之”。并且“依照现行之中华药典或将行之国医药典或其他古今名方可资根据者造成各种剂品”，也就是将中药用西药的方式制造出来。

3. 指导药材运销。主要是划定药材等级标准，规范药材交易市场；健全药农组织；指导药材包装储藏运输等项。

4. 试验研究。为了鉴定省内药材的良种，掌握药材收获的时间以及对主要病虫害的防治。使更多的药材品种能够实现产业化种植，适应战争的需求。试验具体有：药材品种间有效成分之化验、药材收获期间之试验、药材病虫害试验、药材副产试验、药材之生理试验、秘方之科学化试验。

5. 培育专业的药材技术人员。联络中西医院及有关医药的机关，委托个医药及农学研究机关或学校研究国药及训练人才，调查各级医药学校毕业生人数，招收实习生并训练干部人员。

其机构设置如下^②：



^①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 10 月

^②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 10 月，76 页

政府拨给的经费如下^①：

单位：元

项别	民国 30 年	民国 31 年	民国 32 年	总计
药产培育费	200, 000	250, 000	300, 000	750, 000
药厂设备费	500, 000	300, 000	200, 000	1, 000, 000
药产运销费	50, 000	50, 000	50, 000	150, 000
训练费	50, 000	50, 000	50, 000	150, 000
研究试验费	90, 000	100, 000	110, 000	300, 000
管理费	50, 000	60, 000	70, 000	180, 000
总计	940, 000	810, 000	780, 000	2, 530, 000

从民国政府对药材业的扶持计划来看，计划中已基本涉及到现代农业的各方面，从而可以看出，民国政府意图引导药材业的现代化生产。但是由于抗战的进行，政府财政困难，实际上述计划并未完全执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农村部组织大面积栽种大黄常山。民国 31 年中央政治学校栽种常山 1000 亩，民国 34 年 7 月，成立常山种植实验场，以期在“国防运输断绝，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代替奎宁之原料”，达到药物自给自足，裨益抗战医药需要^②。当时军政部军医署，又在北碚和重庆近郊沙坪坝辟地 400 余亩，开设药苗种植场，并选委国内药学专家任场长，该场除种植欧美药用植物外，并利用国产道地药材以代替西药。栽培药物 400 余种，主要大量种植毛地黄、除虫菊、印度大麻、曼陀罗、巴豆、大黄、小茴、陈皮、肉桂、蓖麻、常山、白头翁、延胡索、乌头、使君子、苦木、白芷、吴茱萸、牛蒡子、紫苏、胡荽、薏仁等，成效显著^③。

2.3.4 市场容量的扩大：消费者理论分析

在经济学中，市场容量是指在不考虑产品价格或供应商的策略的前提下市场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吸纳某种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数目。所以市场容量实际上就相当于需求量。近代四川药材市场之所以繁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市场的扩展。重庆开埠设关后，从海关造册处历年编制的《通商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所列的设计表上可以看出，出口土货品种以生丝、药材、麝香为主，其中药材的出口值为 17 万海关关两，麝香为 14 万海关两，分别占出口

^①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 10 月，78 页

^②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24 页

^③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第 79 页

总值的 16.4% 和 10.3%，并且这样的出口商品结构一直继续发展^①。此后，药材出口持续上升，常年出口品种达 150 种。大宗品种有当归、党参、川芎、姜黄、白芍、贝母、附子、黄连、麝香等。在海关表册上所列的许多药材中，多数是销往国外市场，从 1891 年至 1910 年，四川累计出口值为 16596 万关两，平均每年递增 30.7%，出口商品有 50 多个品种，其中药材累计出口值 3118 万关两，为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 18.8%，居全省出口总值的首位^②。

从药材生产的角度讲，药材的产量是固定的，而海外市场的开拓增大了市场容量，导致药材价值变得奇货可居，价格上涨，比如大黄，1893 年输出数量为 6284 担，价值为 94262 海关两，而到 1901 年输出量为 5760 担，价值升到 132469 海关两^③，8 年间价格从 1893 年的平均 14.5 海关两/担上涨到 22.998 海关两/担，价格上涨了 1.5 倍有余。

药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得药材商盈利大大增加，从事药材行业的人也相应增加，比如中坝经营药业的商人，清光绪年间有 20 余家，而民国 35 年统计，则达到了 82 家之多^④。

近代四川的药材贸易与清末之前比，有了质的变化，川药的商品输出重心，开埠之前为国内为主，开埠后则大量出口，输出到国外市场，山货为外国所垄断。药材与其他商品一起成为列强掠夺的资源，近代四川开始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殖民地化程度加深。1891 年起四川的山货药材业，为英国的立德、隆茂、白理等洋行，法国的东方、利昌、吉利等，德国的瑞记、宝丰、德昌等，日本的新利、鹤龄、日森、三井等洋行所垄断^⑤。

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市场化，外国需求的拉动下推动山区的市场化，农村副业繁荣。农民的生产开始与市场紧密相连。农业生产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因此，新形势下出现了新的特点：经济效益。

总之，重庆开埠后到民初的一段时期，是近代四川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不仅仅是药材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是近代四川农业结构最优的历史时期。张学君等学者就认为清末民初是四川场镇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四川历史上多数场镇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⑥。

^① 周勇、刘景修：《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27 页

^② 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对外贸易经济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2 页

^③ 周勇、刘景修：《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122 页

^④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410 页

^⑤ 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 年，546 页

^⑥ 杜受祜、张学君：《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3. 药材市场商业网络分析

3.1 省内主要药材市场

四川药材主要产地在丘陵和高原地带，药材市场则集中在四川盆地的边缘，如巫山县龙溪乡场“以贩卖药材为大宗”^①，崇庆三江镇“土产郁金、白芷、姜黄诸药，岁输出境有郁金十数万斤、姜黄数十万斤、白芷亦二三万斤”^②，通议乡输出药物以川芎、泽泻为大宗^③，青城山麓的“灌县太平场和中兴场就以购集药材贸易为其大宗”^④，邻近的泰安、两河、中兴、大观及本乡农民不少采集小宗中草药入市，很早就形成了市场。同时，受自然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药材集散地也都集中在水运或陆运中心，四川药材的集散市场大致分布于：川东的重庆、合川、涪陵、万县；川南的雅安、叙府、泸县；川西的灌县、成都、内江；川北的广元、江油、潼川、渠县等地。地处金牛道上的广元，有“小益州”之称；南充当嘉陵道上，号称“小成都”；宜宾位于石门道起点，是川南民族物资集散地；泸州当陕路要道；乐山，古为阳江道起点；灌县为西山要路；雅安是川西少数民族物资集散地^⑤。这些都是陆路的交通要冲，处于水道枢纽的集散市场，如长江干流的宜宾、泸州、万县，岷江的乐山，沱江的内江、资州，涪江的遂宁、太和镇，渠江的三汇镇，以及涪江、嘉陵江、渠江三大江交汇的合川，都先后发展成商业贸易中心，而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既是西南地区贸易的中心，又是四川与外界贸易的咽喉。

总的来说川内药材集散地分六路：西路以灌县为中心集中于青海部分、

^① 光绪《巫山县乡土志》，卷三。

^② 民国《崇庆县志》，“食货志”第十，4页

^③ 民国《崇庆县志》，“食货志”第十，4页

^④ 张学君、杜受祜：《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17页

^⑤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288页

川西、松潘、理番、茂县、汶县等地药材；西南路以雅安为中心，集中川西南及滇、黔的药材；南路以宜宾为中心，集中川南及滇、黔的药材；北路以江油的中坝为中心，集中甘肃以及川北药材；东路和中路以合川、万县为中心，六路药材汇集于重庆，由重庆转口运销全国各地。

3.1.1 重庆市场

重庆为川江重镇，交通便捷，商务繁盛。清光绪二十七年（1895年），重庆开埠以后，不仅外来药物输散内地各县，而且更大量地从内地吸收药材货物的吐纳总口，成为全川乃至我国西南贸易之枢纽。在极盛时，药材输出总额曾达千万多元，品种122个^①。其中输出价值在10万元以上者有当归、白芍、川芎、麦冬、天雄、贝母、姜、郁金、大黄等；5万元以上的有党参、虫草、羌活、五倍子、泽泻、半夏、枳壳、黄连等；2万元以上的有白芷、牛膝、附片、黄芩、杜仲、藜朮、天麻、青木香、巴豆、陈皮、使君子等^②。其销场不仅运销国内江苏、浙江、广西、广东、河南、湖北、湖南、宁夏、上海、福建、台湾、香港，且远销国外如日本、安南（越南）、法国、南洋群岛等地^③。

重庆药业各字号、行栈均分帮口，集中的药材百种以上，年出口值达600多万元^④。至民国23年，各帮口家数如下^⑤：

山土字号：碧口帮驻渝设庄者计12家；雅州帮驻渝设庄者计3家；渠河帮驻渝设庄者计6家；叙府帮驻渝设庄者计9家；绵州帮驻渝设庄者8家；灌县帮驻渝设庄者9家；广元帮驻渝设庄者3家；中坝帮驻渝设庄者计10家；中江帮驻渝设庄者计4家。

广土字号：申帮计11家；广帮计28家；浙帮计6家；怀帮计5家；汕头帮计3家；汉口帮计3家；湘潭帮计9家。

行栈：广药行栈帮计5家；土药行栈帮计24家；零售行栈帮计2家。

^① 重庆中国银行编《四川省之山货》下卷，民国24年，74页

^②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524页

^③ 重庆中国银行编《四川省之山货》下卷，民国24年，74页

^④ 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中华书局，251页

^⑤ 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55页

铺户：有铺户 67 家^①。

重庆市药材业调查统计表^②

主要营业	牌号	实收资本(元)	往来行号		最近三年盈亏额(元)			二十四年度营业总额(元)
			行号名	金额(元)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渝帮药材	日升昌	6000	永庆钱庄	5000	+2000	+4000	0	60000
渝帮药材	自立诚	30000	永庆	40000	0	+3000	+20000	400000
渝帮药材	恒祥	10000	永庆	10000	——	——	0	100000
渝帮药材	义德祥	10000	中国银行	10000	-10000	+18000	-6000	120000
渝帮药材	丰蔚祥	40000	永庆、聚兴诚银行	60000	-300000	+30000	-12000	400000
渝帮药材	镜记	10000	永庆	10000	+1000	+2000	-1000	70000
渝帮药材	义泰祥	10000	永庆	10000	——	——	+3000	60000
渝帮药材	永森祥	10000	永庆	——	——	+2000	+3000	60000
渝帮药材	义记	6000	永庆	10000	+2000	+3000	-2000	80000
药材行栈	义诚	3000	永庆	5000	+4000	+2500	0	180000
药材行栈	瑞昌祥	3000	永庆	2000	——	0	-1500	100000
药材行栈	吉昌永	3000	永庆	2000	——	——	0	100000
药材行栈	福昌祥	2000	永庆	2000	-1200	0	+500	80000
药材行栈	永世福	2000	中国、重庆银行、永庆	3000	+1500	+500	+4500	60000
药材行栈	吉祥荣	3000	永庆	3000	+500	+1500	1500	130000
药材行栈	正泰隆	4000	永庆	10000	——	+3000	0	260000
药材行栈	恒泰公	10000	美丰、中国、重庆、永庆	10000	+7500	+2500	+4000	260000
药材行栈	正泰和	10000	永庆	20000	-7500	4500	+2500	300000
药材行栈	祥源	10000	永庆	100000	+10000	7500	+10000	280000
药材行栈	裕成永	10000	永庆	2000	+2500	7500	+6500	270000
药材行栈	公心长	3000	永庆	5000	-500	0	1500	130000
药材行栈	聚泰隆	10000	永庆	5000	-2500	0	1500	240000
药材行栈	志诚祥	10000	重庆	5000	+8500	+4500	0	270000
药材行栈	裕丰合	3000	永庆	2000	——	0	0	60000
药材行栈	源兴长	5000	永庆、中国	5000	+1500	+1200	0	180000
药材行栈	恒丰泰	6000	永庆	5000	+1500	+1000	0	70000
药材行栈	谦泰隆	10000	永庆	5000	0	-1500	-1500	130000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重庆药材字号虽多，但经营规模普遍不大，资本上 1 万元者仅有 14 家，超过 1 万元的仅有 2 家。这些店铺一年的营业总额也不大，民国二十四年度的营业额超过 10 万者只有 17 家，各家店铺每年盈亏额一般在 1 万元内，资本额与盈亏额最大的丰蔚祥，甚至在民 22 年亏损 30 万元，为各商户之最。

^① 重庆中国银行编制：《四川省之药材》，民国 23 年 9 月，第 76 页

^②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二十章，出口业，民国 28 年，74 页

重庆药材字号从西南、西北各药材产区组织川产药材，主要通过乌江、綦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和渠江 7 条线路实现。其中以岷江、嘉陵江、涪江三线为药材进货线，在各路上的城镇中以灌县、碧口、宜宾、中坝等中型药材集散市场为进货地点，在各路上输送的主要药材有云黄连、云茯苓、云半夏、防风、鹿茸、党参、大黄、黄芪、甘草、白芍等大宗品种，以及天麻、虫草、贝母、麝香、当归、川芎、麦冬、附子、附片等特色药 100 余种^①。但做出河的字号一般不直接向上述集散地进货，而是在重庆接头，这些货都是由做出山的字号（山货帮、土货帮）从各线路上的集散市场运销重庆的药材。

在重庆接买的药材，一般是在产地就地加工、分出等级，并实现优质优价，如川芎加工后，分为贡芎（每斤 18—28 个）、芎王（每斤 30—40 个）和统芎（每斤约 40—60 个）。这三个级在清末时每级差价 2—3 两银子^②。

重庆药材字号在输出山土药材的同时还负担洋广药材的输入。由汉口、上海、广州等地输入洋广药材约 50 多种。这些洋广药材在长江未通轮船之前，由宜昌交木船运达重庆后，再输入内地各县销售。山土药材输出量与洋广药材的输入量之比例大体是：山土药材约占进出数量的 70%，洋广药材约占 30%^③。

辛亥革命后，药材各帮竞争日益激烈，四川药帮开始向外运销。民国 4 年首由重庆商组织的“大川源”向汉口运输药材。在竞争中四川药帮将生意做的较活，利润看得不太厚，争取流转速率；同时做到货真价实，在外埠信誉昭著，取得较大优势^④。当时重庆较有名的有：天福同、正大诚、义长、同义长、裕源长、大川源、自立诚、丰蔚祥、翁鸣记、诚成、天增公、永庆、四川药材公私等牌名字号。如天福同的天麻、大半夏、福字杜仲、自立诚的双喜牌虫草、声字头当归等品种一运到香港，不仅不看货，且价格比同类药材高约一二分银^⑤。民国 16—17 年，为重庆药材市场极盛时期，经营药材行栈业务的商户达 80 家，运销商 220 家，广药铺约 25 家，择药批发约 120 家，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二十章，出口业，民国 28 年，85 页

^② 重庆中国银行编《四川省之山货》下卷，民国 24 年，75 页

^③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67 页

^④ 重庆中国银行编《四川省之山货》下卷，民国 24 年，84 页

^⑤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27 页

从业人员 2000 余，行商小贩深入乡村销售为数更大，药业市场繁荣居重庆商业市场交易第四位^①。

3.1.2 成都市场

成都为四川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川西交通的枢纽，水陆交通方便。陆路上东有成渝公路，南有成嘉（成都至乐山）、川康公路（成都至原西康省）、西有成灌、北有川陕公路。水路上成都地处岷江上游，蜿蜒东门外的府河顺岷江而下，南到宜宾，衔接长江；东与简阳县的沱江衔接，通过泸州与长江联运。重庆开埠前，四川的综合市场在成都，宋代《方輿胜览》上记载“成都大慈寺五月鬻香药，号药市”^②。从药材资源看，灌县的川芎，双流的郁金，绵阳的麦冬，江油的附子，洪雅、峨眉的黄连等名贵、特产药材主要在成都集散，川西北和阿坝、甘孜、凉山民族地区，以及雅安等地的麝香、虫草、贝母、羌活、大黄、牛膝等大量野生动植物药材亦多在成都集散。

成都药业计有商店约三百家，从业人员 1200 余人^③。所经营的药材大部分是川省所产，也有少量从省外运来配售的。民 24 年整个成都药材业营业收入大致是 150 余万元。此后，因各方面的原因，营业不振，影响所及之处，相继递减。至民 25 年，整个行业营业额已锐减至 70 万元。“致该业欠债过多之商店，已多有歇业。因此失业店员，常向同业求雇，并愿以最低工价工作；但谋得安插者实属寥寥。此外因药材销路薄弱，于成灌道上专挑药材之力夫，亦多歇业。”^④

成都药栈买卖的药材无广药、土药的分别，但药栈间的交易是无形间有界限的。凡客货堆存甲栈者，乙栈不能代卖，因药栈堆存客货不取堆费，这种办法对客家有好处也有害处。药栈之间，各自为政，没有特别的联络，药栈对于公会，除照例交纳各种经费外，也没有什么关系。成都的择药号，资

^① 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中华书局，第 250 页

^②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年，167 页

^③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28 页

^④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75 页

力雄厚者较少，小组织的多，到民国 36 年有择药号 17 家，参茸号 11 家^①。

民国 32—34 年为成都市场最繁荣时期，各家药栈生意都很好。民国 33 年，每家药栈的营业额，多则为 2 亿元以上，少则为 1 亿元，若以 21 家合计，营业总额为 40 亿元以上（择药号的营业额尚不在内）^②。

3.1.3 万县市场

万县襟江带山，为川东出口门户，水陆运输要冲。自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开为商埠以来，各地商贾多在此舍舟登陆，尤为川西、湖北、云南等地药商投宿之所、药材起卸之地。万县的热闹程度并不亚于江浙一带，因此，万县素有“蜀中第二个大都会”之称^③。

清末万县的交通运输不太发达，只有木船在川江运输，药材信息的传递也很缓慢。因此，中药材运输周转的时间较长，抑制了万县中药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从万县装木船运汉口至少在一个月以上，即便运往重庆也需 20 天左右，一次业务周转长达半年以上。所以，这个时期，万县药业经营不很发达，处于保守状态中，药号仅 10 多家。其中经营出口（含调省外，后同）中药材的，只有一家裕丰太药号，业务资本较大，有银子 8 万两左右，职工 38 人；其余的资本稍逊，仅做点重庆生意；资本再逊者，只作点短途生意。药铺以南津街的怡丰祥（主营眼药、丸药、膏药等）较大，资本 1 万多两银子，职工达 18 人^④。

民国 9 年，有了轮船运输，民国 19 年又有邮政飞机通信，药材信息行情传递迅速，航空信一天就可达汉口、重庆，船十几天就可往返汉口^⑤。同时，药材价格比较稳定，利润亦较可靠。民国 20 年以后，是万县中药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药号由药帮时期的十二三家，发展到二十五六家，主要集中在当铺巷和邱家巷一带。抗日战争胜利后，资本较大的药号为“元记”，相当于现在人民币 2 万多元，其次为福昌、福泰，约 1 万元，一般药号仅几千元^⑥。这个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76 页

^②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76 页

^③ 四川省政府：《四川省概况》，1939 年，75 页

^④ 四川地方志编委会《万县市志》，重庆出版社，2001 年，342 页

^⑤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28 页

^⑥ 万县商业局：《万县商业志》，1990 年，51 页

时期，万县从事药业人员计 300 多人，老板 150 多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药号家数与从业人员略有增加，药铺约增至 90 多家，全部从业人员约五六百人，其中老板 200 余人^①。

万县为下川东的中药材集散地，随着交通及运输工具的发展，中药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从而药业资本亦逐渐雄厚。邻近各县的药商，由于受资本与运输等因素所限，往往只能将药材运至万县，就近出售。因此，万县逐渐形成下川东各县及湖北利川、恩施、秭归、兴山、巴东、咸丰、未来，以及云南丽江等地所产药材的集散市场，如石柱的黄连，云阳的小茴香、川楝、枳壳、佛手花，忠县的巴豆、半夏，湖北的黄连、贝母、大黄、厚朴、红花、党参、银花，奉节的党参、贝母、大黄、厚朴、续断，渠县的白芷、白芍，垫江的粉丹，巫溪的贝母、党参、黄连、城口、万县的党参、黄连、贝母、麝香，开县、梁平的姜黄，巫山的天麻、厚朴、红花、党参、黄连等，这些药材，一般都在产地加工成件后，少量由当地药商贩运到万县出售，大量则由万县药商在新产季节，派出专人赴产地收购运回转销^②。

万县集散中药材品种保持在 500 种左右，以省内品种为主。每年集散数量是：川药约 10 万斤，浙货约四五万斤，怀货约五六万斤，广货约三四万斤^③。这些药材，民国 19 年前仅限集散于川东各县，后来由于药商学会“深购远销”成本较低，销价一般低于重庆市价的 10%，致川北营山、大竹及渠县、梁平、达县、云阳、重庆附近的涪陵、丰都、垫江、以及广安、岳池，湖北的恩施、咸丰、未来，利川、秭归、兴山、巴东、宜昌等地的药商，都乐于到万县市场购货^④。当时，每天上、下行方向的轮船，只只都装有中药材，“离了药材不圆载”，即指每周有二三百件药材调运出口。同时，药材业务很快发展到河北的天津、河南的郑州、禹州等南、北大城市，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3.1.4 中坝市场

中坝，位于涪江上游，与当时彰明县所属的太平、三合两场，仅一衣带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108 页

^② 万县商业局：《万县商业志》，1990 年，52 页

^③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07 页

^④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08 页

水，有渡桥相遇，合称中坝三场，形成江、彰两县经济贸易中心，其中以药材贸易为其支柱。历史上既是川北名贵药材市场，也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土特产药材和本地特产药材——附子的集散地。有称“中坝在历史上一直是川北、甘肃、陕南的药材山货集散中心”^①。

据县志载，中坝场始于元代，原场在双流村，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三年（1664年）始迁今址。当时北面的青川，平武等地来的药材都在此集散，南面从双流、德阳等地来的药贩也能在此买到药材。以后到此买卖药材的人日渐增多，中坝遂形成了省内的一个重要药材市场。中坝经营药业的人，除本地人外，还有省内的成都、重庆、潼八属等地的人；省外的江西、陕西、湖南等，甚至还有外国朝鲜药商。清光绪年间有药店20几家，民国初年则更加发展，约有三十五六家。他们开始只是住上一段时间，例如二月、三月不等，离去再来；以后有的则索性“安家落户”定居下来；也有在此住庄的。从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约有行栈、择药铺82家^②。

中坝药材市场聚散的品种，一般保持在200种左右，如黄芪、当归、大黄、党参、附子等，成交量每年可达1000万斤，其中附子竟占二分之一左右，但其市价常受重庆市场和大宗品种的影响和冲击，因而极不稳定，涨跌无常，幅度很大。中坝药业，在清末时为本地人兴旺，以后，客籍药商逐渐增多，尤其在民国11—12年时达到极盛时期。成都及附近各县的药商都愿到此贩运药材，虽可从重庆进货，但往返时间较长，不及中坝货快和省费用，甚至这些地方连布匹、杂货都乐于到中坝进货。

中坝水陆交通发达，码头常常停有几百号船只等待启运，故当时有“装不完的中坝，塞不满的重庆”之说法，可见其繁盛。中坝市场的药材，一小部分邮寄广东、湖南，大部分运销重庆、成都、赵家渡^③。北门外陆路运输也很繁忙，尤其杨家店一带，药农、药贩卖了货，又要买货回去，有很多利用骡马等畜力运输，故粪便随街可见，仅马店就有20多家，专供骡马“住宿”，一家马店大约能住几十百把匹（药材占其运输总量的很大比重）。专跑中坝、重庆的长路帮每月运载药材要往返3趟，每趟几千斤，每件重量不等（如附

^① 四川省政府：《四川省概况》，1939年，75页

^②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0页

^③ 钟占熙：《四川药材市场概况》，《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2期，1946年5月，第212页

子 500 多斤, 附片 200 多斤), 船只三五只一路。在清末民初时, 由松潘、懋功、甘肃一带运到中坝的药材很多, 每天川流不息, 一天到晚都有货到中坝。例如麻黄, 每年上市量有一二十万斤左右, 一只从头年 10 月卖到次年的三四月间。又如黄芪, 一年有五六十万斤, 当归 100 多万斤, 羌活、赤芍、大黄等数量都很大。

3.1.5 宜宾市场

宜宾居长江上游, 金沙江、岷江汇合处, 为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接壤要道, 川南重镇。每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常在 2000 万元左右, 其中药材达 70 余万元^①。

清光绪年间(1875—1908 年), 宜宾药材市场是在合江门街, 仅有“大有”药栈一家, 为邻近各地的药农和贩运商至宜宾经营的药材逐渐增多, 市场日益繁荣, 感到合江门街既不顺路, 又不便于船舶上下货物, 故将药材市场迁至栈房街。此时, 各行各业一般都没有什么组织, 药业也是一样, 买卖药材漫无头绪, 只要有利可图, 谁都抢先插手, 因此常有纠纷发生。

运商有广、淮、浙和云贵、西北各省药帮, 将药材运至宜宾输出后, 复采办山土药材运回当地。宜宾输出的较大成庄的药材, 主要有巴豆(每年运至重庆的 100 万斤)、黄栀子(10 万斤)、淮山(10 万斤)、陈皮(10 万斤)、天麻(10 万斤)、粉葛(七八十万斤)、姜黄(500 万斤)、叙党(六七十万斤)、青皮(四五万斤)、吴萸(3 万斤)^②。此外, 云南的云黄连、三七、穿山甲、云苓、云风、归身、猪苓、虫草等及其他中小品种, 均在此集散^③。

3.1.6 灌县市场

灌县地处川西平原, 是四川历史上较大的药材市场。川西药材, 除少数取道中霸出口外, 大部分都集中于灌县, 再专销其他各埠。凡甘肃、青海及松潘、理县、汶川、茂县等地所产的大黄、贝母、羌活、木香、虫草、麝香、

^① 《宜宾市志》, 新华出版社, 1992 年, 第 354 页

^② 《宜宾市志》, 新华出版社, 1992 年, 第 354 页

^③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158 页

鹿茸、甲皮、甘松、鹿角等大宗药材，无不荟萃于此，然后转运成渝各地销售。灌县药材市场的形成，主要由于它是：

(1). 药材转运地。山货药材主要是靠骡马载运，人力较少，冬天则用牦牛载运，到灌县后须改用运输工具，因无公路，多用木船水道运出或人力运出。

(2). 商品交换地。山区人民，尤其是藏族同胞的生活日用品多以药材交换，在灌县出售后再运回所需的粮食、布匹、食盐、茶叶等。其中以茶叶为大宗，每年进山换药用茶几十万公斤。

(3). 药材选择地。山区到灌县的药材多为粗货，未经选择，特别是未按各地习惯用药的规格要求进行选择，故在灌县必须经过一次整理，分别不同规格，然后包装启运。如贝母，由于各地需要的规格不同，故须选择：正松贝（闭口），主销广州，再运至新加坡；冲松贝（开口），主销上海；油子，销湖南；黄子，销其他城市；贝心贝瓣销四川附近各县。

(4). 药材成交地。药材集中于此，外商多在此进货。“水客”^①不愿进山收购，因交通不便，货较零星不成宗，即便组织挖药，时间又长，故多在灌县进货。“山客”^②也不愿长途运输，只将药材运至灌县为止，故灌县成为药材成交地。

灌县药材市场的交易活动，是在城关、石羊和太平等三处进行的^③：

城关市场：主要是集散大山货即松潘、草地、理县、大小金川等地药材，其中大宗品种有贝母、羌活、甘松、大黄等，小宗品种藜苳等。每年集散数量较大的有贝母几十万斤，最多时高达百万斤，甘松、藜苳百万斤以上。这些品种直接销本地很少，多由灌县转运国内各地及国外销售。

石羊市场：灌县河西一带生产川芎，形成以石羊镇为中心的川芎药店^④。据光绪《灌县志》载：“赴河西石羊场，买运川芎、泽泻较别场有独多者焉”^⑤。为农村初级市场，药材直接上市，有行栈收，为农村初级市场，药材直接上市，有行栈收，也有“药滚子”代收。品种以当地药农主营的川芎、泽泻

^① 即买方，因大都通过水路贩运，故称“水客”。

^② 即卖方，因卖药材者大都是从山里挖采，故称“山客”。

^③ 主要参考：张学君：《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

^④ 张学君、杜受祜：《近代四川场镇经济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7页

^⑤ 光绪《灌县志》，卷11，第3页

为主。最高年产量川芎达五六百万斤，泽泻几十万斤。

太平市场：以柴胡、前胡、寸心草等土产杂药为主，产量约几十万斤。种类较多，据《灌县乡土志》载：太平出产 200 多种，当地农民作副业经营^①。

上述三市场，以城关市场影响最大，民初设有英、德洋行，收购药材羊毛等土特产品。该场药材的吞吐与集散，主要靠三个行业进行，即卖帮（山客帮）、买帮（水客帮）及行栈。行栈最多时有 20 多家，其中较大的有四五家。它们主要集中在东街，择药铺只二三家。从清同治年间（1862—1874 年）至民国 37 年计成立药栈 48 家。

清末民初，灌县药业非常繁盛。大帮成批药材用骡马运，小帮零星药材是人力背挑，集中在灌县的药材就此分散了。到灌县采购药材的有赵镇帮、成都帮、嘉定帮、叙府帮。此外，陕帮、江西帮、河南帮等。以重庆帮为大，成趸经营，其他帮较小，经营小宗杂药，运重庆主要用木船，陆路很少；公路通车后车运的也不少，每年营业额在 100 万元以上。

各地药商来灌县进货的，必须经过药栈掌柜从中介绍。按照当地药栈的习惯，凡是药栈掌柜介绍水客进货，只许和本栈往来的山客交易；这与一般经纪人可以普遍介绍人有区别。所以凡山客寄住越多的药栈，其营业越发达，所收益的佣金也越丰厚。药栈广招徕之道，除待客周到以外，还需要保留相当的资金，遇到山客没有耐心久待而又急需现款周转时，栈主就估计其存货价值，再以相当于时价的十分之六七的现金暂给山客，以供周转。山客存栈的货件，也托掌柜负责脱售，待山客再带货下山时，再行结算。佣金为货价的 3.2%，即价值百元的货物，取手续费 3.2 元。山客寄居药栈及药物寄存，概不收费，伙食也由药栈无偿提供。省外药商也有在灌县直接进货的。

从上述几个重要的药材市场可以看出，受自然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药材市场呈明显的区域化。交通便利是场镇发展的必要前提。毫无疑问，近代的药材集散地都集中在水运或陆运中心。宜宾位于石门道起点，是川南民族物资集散地；灌县为西山道要路；万县、宜宾都是长江干流要冲；上面未提及而稍次的雅安，是川西少数民族的物资集散地^②；而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既是四川内地贸易的中心，又是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贸易

^① 清·徐昱：《灌县乡土志》，都江堰图书馆，2006 年，35 页

^②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288 页

的咽喉，可以说既是药材集散地，又是出口地。

四川药材各个集散市场均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如西路集散地灌县，位于岷江上游内外江分界点，是岷江两江航路的终点，岷沱水路与松潘草地、川康北路均以此为联络点，即灌县乃成都平原之西北要冲，是通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要道。因此灌县自然成为药材的西路集散中心，川西北以及青海的一部分所产药材，均集中于此。故灌县商场贸易的繁荣程度，在成都平原中除成都外无匹敌的地区，有“山货药材出口总汇”的称誉^①。

3.2 市场交易概况

3.2.1 交易方式

药材市场交易，全由行栈介绍，卖方不得直接同买方交易，更不准由非行栈人介绍业务。每天上午，行栈中的上街先生到各家字号赶场报盘。12点钟后在茶社打听行情，夜间也去，所有交易即从中产生。其交易手续分四步^②：

(1) 看货议价：买方在行栈或山土字号和广土字号看货，当面议价。

(2) 成交：药材成交时，须用公会制发的四联交单：买卖双方各持一联，公会一联存查，一联留行栈作存根^③。成交后，卖方与行栈为直接债券债务关系，如买方发生倒闭等事，与卖方无关，故当时行栈有“三五易得，九五难赔”之说。

(3) 发货：行栈发货，有由行栈径发至买方，但也有行栈通知卖方，请直接发往买方者。

(4) 交兑货款：期限为1个月，但可分为两期交付，如初十前交易的货款，15日付给一半，余下一半在月底付清；25日前交易的，当月底付半数，次月15日付清，但收款人须在此期前3天通知付款人，到期兑现。收款后由收款人盖章或出具收条为凭。

这是一种典型的比较原始的市场交易方式，形式有同产生于小酒馆的欧

^① 《灌县经济概况》，《四川月报》，1938年5、6月，第12卷210页

^②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127页

^③ 见第二章第三节交易药材收据表。

美早期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方式较自由和不受约束，无固定的规章制度，靠沿袭下来的习惯维持市场纪律。

3.2.2 资本来源及金融状况

川帮资金均不太雄厚，资本总额约 200 多万元，其中广土字号约 90 万元，山土字号约 70 万元，行栈约 40 万元。字号资本较大的为四川药材公司，有百余万元，余则一二万元不等，行栈资本较大者为“同新”，约 24 万元，小者三四千元，甚至仅数百元^①。其资本来源大多采用做汇票、借款和存款等方法措集。

做汇票：钱庄作预期申汇，先放款给上海字号，限期 6 个月，息为 1 分 3 厘至 1 分 5 厘，上海售货款期是 1 个月，川帮就利用限期来进行营业周转。

借款：每年旧历四、七、十月正值外山来货甚涌，并接近节气之际，深恐临时需用或周转不过来，故向银钱业借款以资救济。常分长（三四个月）、短（半个月）期两种，但以短期较多（可少耗资金）。

存款：亦接受亲朋好友存款。也分长（1 年）、短（4 个月）期，但一般以长期为多。

3.2.3 利润分配情况

川帮药业经营的正常利润，一般在 20% 左右^②。但有的药材，头年买进，次年卖出，利润则更高些。例如：厚朴、党参即是，厚朴头年买进成本四五十元，次年由万县运至成都可卖一百元，除去人力挑运费十元（以一担即 100 斤计），还有较高的利润；党参买本一百元，次年运至汉口或广州，可卖两百元，如遇全药帮无货，独家所有的缺货药材，其价就随心所欲了，可谓“一本十利不为贪”，但这种情况，转瞬即逝，往往很快结束，因“价高招远客”^③。

川帮经营药材，不仅善于随行就市，而且还能掌握药材“一季产、全年销”的特点，绝大部分药号都有一年的储备货，市价高昂则出售，市价低落

^① 《重庆近三年来之药材业》，《四川月报》，第 10 卷 6 期，1937 年，第 124 页

^②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09 页

^③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12 页

则停售，即使个别品种跌价，也不影响整个利润的获取，因为经营药材的花色品种较多较全，可互为弥补。此外，新货初上市时，采取销地降价，产地提价的方法，刺激药农大量采集出售。新货上市后，待小商买的差不多了，药帮便压价收购，如黄连产新上市，由原价的 120 元降为 100 元，产地却由原 80 元提高到 90 元收购。川帮药业计算盈亏形式，多以实物计算，即某一笔生意成交一千斤后，能买回一千二三百斤，才为盈利；年终结算时商品盘存多了，也才认为这一年盈利了。“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很少‘上架子’（借别人资金做生意）。"^①当时的药材业并无相关的风险规避措施，药材商人实行低买囤价高卖的策略，基本属于一种投机行为。

四川有不少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择要铺和咀片铺，对于药业经营与药物加工炮制非常讲究和认真，从而使自给获得高额利润，如万县市的怡丰祥药铺，由于眼药、丸药、膏药的疗效好，业务有很大发展，资金达 1 万多两银子^②。抗战前后的保元堂药铺，因药材选料认真、加工精细，在群众中信誉很高，几十里远的农村都有人去配药，是当时万县咀片业务最好、声望最高的一家^③。一般药店对药材加工亦很考究，厚朴要铡成“万卷书”，桂枝要切成“柳叶片”，甘草铡成像“瓜片”，有歌诀“白芍铡来不烂边，防风铡来飞上天”，可见技术十分精湛^④。

郝延平先生在他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中说到“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被仅仅看做是地区间贸易的一种特殊的和不重要的形式，它的发展包容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之中。而且，它的数额同中国的国土、人口和特产相比是微小的。更重要的是，对外贸易所促进的新的经济增长只是很微弱地渗透到传统经济中去；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在条约口岸内，这些条约口岸在许多方面成为由外人左右的‘国中之国’。因此，中国经济的近代成分是孤立的，处于传统的经济的边缘——或者用陶尼的话来说，犹如古老的长袍镶上的一条新式花边。”^⑤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的市场形成的动因在外部而不在内部，其以后的一系列发展和变化，也和其与世界市

^①《四川药材业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1990 年，19—20 页

^②《万县市志》，重庆出版社，2001 年，342 页

^③《万县市志》，重庆出版社，2001 年，342 页

^④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129 页

^⑤李荣昌、沈祖炜、杜恂诚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第 261 页

场联系的加深和世界市场的兴衰相关联。正是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注入中国国内市场以各种近代化的因素。

这种近代商品市场的商品流向与传统市场不同，它主要是高附加值、高价格的工业品由沿海城市流向内地，药材、农副产品包括矿产等初级产品由内地流向沿海城市再出口到国外，这种流向的改变到19世纪末已经基本形成，建立了一个以上海、广州等沿海通商城市以及武汉、宜昌、重庆等沿江通商城市为中心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同时新出现的行业比比皆是，如棉布业、百货业、五金业、西药业等等。与其相关的内地商业网络也大多是新建的，经营方式多采自西方。这些新式商业或由买办所投资，或为外地商人所投资，也有为旧式商业资本所转化，由经营土货的商店改为经营洋货或兼营洋货。中国传统的商业市场比如本文所叙述的药材市场受到外界影响而发生变化，并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卷入国际市场，被纳入以外国洋行或公司为主导的商业体系中。但是这些商业在新的市场格局中，由于墨守成规，与那些欣欣向荣的新式商业相比，总是处于一种衰落的境况。

3.3 药材市场与金融业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流通必然伴随着货币流通，城市是商业中心，必然也是金融中心。商品流通的全过程就是商品和货币不断地互易其位并把产品从生产领域输送到消费领域的过程，它必须有相应的货币流通过程相配合。所以商品流通过程和货币流通过程是互相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两大系统。城市金融业除了担负完成商品流通的功能外，还执行独立的金融功能，如建立资金的横向联系和流动，融通和筹集资金等。因此，药材业的繁荣，相应的城市金融业也发展很快。

典型的要数重庆地区的金融业。虽然我们说重庆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因为药材业的发展才发展起来的，它是由众多的商品市场发展起来的产物，但是，药材市场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子市场，我们有必要研究下它与金融业的联系。

药材行业作为一种传统的商业行业，交易环节中很注重“信用”，赊购赊

销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普通药栈之类的商家，其资本量并不大，多者几万，少者数千，如果没有当地票号钱庄的支持，是很难经营下去的。事实上，对于药材业最为发达的重庆，也相继建立了许多金融组织。

重庆地区最早的金融组织是山西票号，重庆开埠前有 16 家^①，光绪年间重庆的山西票号增至 27 家，光绪末年已知的重庆 16 家票号名和资本如下：

重庆票号表^②

票号名	资本 (万两)	票号名	资本 (万两)	票号名	资本 (万两)	票号名	资本 (万两)
日升昌	3.0	乾盛晋	13.7	天成亨	11.0	蔚长厚	10.0
新泰厚	12.0	大德恒	13.7	元丰玖	16.8	协同庆	13.7
蔚盛长	13.7	存义公	10.2	蔚丰厚	16.8	晋昌久	16.8
乾盛亨	13.7	百川通	10.2	三晋源	16.8	宝丰隆	5.0

16 家票号中，资本少的 3—5 万两，多的达 16 万两，总资本达到 197.1 万两。

除了票号，重庆的钱庄业务也十分发达，重庆开埠后，商业活动发达，钱庄业务也随之扩大，大有取代票号之势，“同业日增，业务日繁”。1909 年成立钱帮公所，处理同业纠纷，改善业务，重庆钱业于是规模初具，“全川金融赖以调剂，省外汇兑藉资周转，为钱业兴盛之初期”^③。1910 年重庆有商银钱号 28 家，见下表：

重庆银钱业表^④

号名	营业分类	资本 (万两)	号名	营业分类	资本 (万两)	号名	营业分类	资本 (万两)
至城洋	账庄	1.0	谦泰恒	账庄	1.2	德生祥	账庄	0.6
谦祥益	账庄	1.0	谦敬胜		1.0	聚成亨	账庄	1.0
信义复	银号	1.4	和丰号		0.5	协顺昌	银钱号	1.1
德厚昌	账庄	1.1	义厚生	账庄	1.1	同茂恒	银钱号	0.7
裕源通	银号	1.0	福茂荣	账庄	0.5	协庆隆	账庄	0.5
集成亨	账庄	1.0	瑞昌厚	账庄	0.4	永盛祥	账庄	1.2
同升福	账庄	0.45	德利源	账庄	0.6	源达长	账庄	0.5
同泰丰	账庄	1.2	德泰明	银钱号	0.1	裕源长	账庄	1.2
协顺文	账庄	1.0	协心和	账庄	1.0			
惠和号	账庄	0.5	长生号	银钱号	1.0	计		23.85

28 家银钱号共计资本 23.85 万两，平均每家 8500 两左右，其中 5 家是独资，其余均为合股。从营业状况看，1910 年无盈亏者 8 家、亏 1 家、盈利 19

^① [日]根岸佑：《清国商业综览》第 5 篇，〈清国货币及银行〉第 275 页

^② 资料来源：《票号在四川的一些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

^③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银钱业〉D48 页

^④ 资料来源：《四川第四次劝业统计表》第 36 表，四川劝业道署编印，1910 年

家。这段时期正值开埠不久，药材出口贸易繁荣期，1910 年药材的出口额为 232 万两^①，为出口递增阶段。

不仅重庆地区金融业发达，其它大的药材市场如成都、灌县、万县等地区，金融业务均发达，1910 年成都光票号就有：日升昌、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蔚盛长、天顺祥、蔚丰厚、百川通、协同庆、存义公、裕川银、恒裕银、金盛元、宝丰银、宝丰隆、宝丰厚、蔚长厚等 34 家。^②商银钱号计 20 家，资本计 82.9 万两^③。万县在光绪初有所谓“换钱铺”五六家，光绪 21 年（1895 年）设立利顺泰、协和炳、永泰益三家钱庄。两年后成立裕泰源、同仁和、德顺仁、同兴荣、茂盛泰等钱庄。^④

当然，这段时期的金融业发展无论从资金还是业务范围来讲，都是比较小的，无法和上海等地相比，但这代表了近代金融业发展的历史趋势。从票号、钱庄到后来产生的银行，无不是适应了工商业的发展的需要，两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① 见第一章第二节“1891—1947 年四川省土货出口总值及主要商品表”

^② 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 年，78 页

^③ 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第 276 页

^④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银钱业>，D49 页

4. 抗战以后川药市场的衰落与萎缩

抗战爆发之后，四川药材贸易的出口远不如前，“战前每年山货药材交易在 130 万元以上，战起后各种山货药材交易停滞”^①。从事药材贸易的商家数量也急剧减少，以重庆为例，当时的“字号、铺户与行栈由极盛时期的近 400 家减少到 81 家，陷入奄奄一息的困境”^②。

4.1 衰落原因的制度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民国二十年以后四川土货和药材出口统计表^③：

年度	土货出口总值 (万关两)	中药材(万关两)
1931	3637.55	533
1932	2604.18	327
1933	2755.54	274
1934	2308.43	275
1935	2358.23	236
1936	3765.70	363
1937	3943.43	345
1938	1669.31	247
1939	987	224
1940	1131.91	166
1941	2020	/
1942	/	/
1943	8.40	/
1944	218.30	/
1945	232.30	/
1946	/	83
1947	/	38
1948	/	/
1949	/	/

民国二十年时，四川药材出口为历年之最，达到 533 万关两，此后每况

^① 《商业：抗战起后灌县之市场概况》，《四川经济月刊》，第 9 卷 6 期，1938 年 6 月，第 22 页

^② 《四川药材业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1990 年，25 页

^③ 资料来源：数据出自甘祠森编《最近四十五年来（1891—1935）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月刊第三种。

愈下，民 36 年仅为 38 万关两，可见整个药市萎缩之剧。实际上，药材与其他农副产品一样，需要靠天吃饭，加上民国时期四川和全国政局不稳，所以历年来四川的药材市场起伏不定。

“民十一至十二年间，四川内战剧烈，药材商人多不敢冒险运货，致遭损失；故出口数字，骤形锐减。民十三年，川局略为平静，省外市场亦需货迫切，故药材贸易，渐复旧观，各货出口总数约较上年增加百分之六十。民十四年，香港、广州，时局紊乱，药材贸易，殊受影响。是年减少三十余万，约合百分之十二，较上年略为逊色耳。民十五年至十八年间，川药出口，尚能维持旧状，甚至略有增加。麝香、大黄，输出尤为畅旺。盖此项物品半由陕西输入，因北方连年烽火不靖，故多改道由川出口也。民十九年至二十两年之中，是为川药出口之黄金时代。内地出产既丰，省外需要亦巨，于是输出激增，突破历年之记录。其中重庆药帮虽遭临江门著名之巨大火灾^①，损失惨重，然多保险，倒闭者仅少数未保险之行栈耳。民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来，药材贸易，渐次陷于衰落之境。因我国多种出口药材，已被外人栽种成功。品质既精，价值复廉，以恶劣之国药，自然遭其抵制。如川药大黄，素占出口首位；今因日人在台湾所种之大黄已告成功，畅销我国，于是川省出口大黄，乃退居第十地位。举此一端，可以概见。今后国产药材，苟不铲除旧法，力求改良，必堕丝茶之覆辙不远矣。”^②

从上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虽然药市随自然、政治影响波动较大，上世纪 30 年来左右，虽然消长不一，但就整体四川药材行业而言，则是呈现一个逐渐萧条的局面，环境日趋恶劣，药材业店铺经营倒闭的状况时有发生。

^① 民国十九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重庆储奇门一带发生空前火灾，药材帮适当冲要，房屋货品悉被毁灭。火灾之后货品断绝，交易停顿，对川省药材业影响深远，称“八二五”事件。

^②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62 页

灌县历年倒闭药栈表^①

牌名	倒闭年度	牌名	倒闭年度	牌名	倒闭年度
瓊林栈	民国十九年	明远栈	民国二十年	天泰栈	民国二十年
鸿义栈	民国十八年	西昌栈	民国十九年	天德栈	民国十二年
洪昌栈	民国二十二年	大盈栈	民国十四年	执中栈	民国十七年
大亨栈	民国七年	杏安栈	民国二十四年	开泰栈	民国二十年
聚莱栈	民国十五年	吉祥栈	民国二十三年	福泰栈	民国二十二年
金茂栈	民国八年	庆云栈	民国十三年	明星栈	民国十年
全盛栈	民国元年	集义栈	民国七年	怀庆栈	民国二十四年
德缘栈	民国二十四年	德新栈	民国二年	通华栈	民国十六年
永和栈	民国十二年	杏林栈	民国十六年	拿和栈	民国二十年
泰安栈	民国十八年				

就灌县药业而言，历年倒闭的药栈中，民国十五年前较少，民十五年以后则逐年俱增。在上表列举的倒闭的二十八家之中，民十年以后倒闭的，占十八家之多，可见药材业营业的困难度。

对于四川药材市场经历的由明清时期的繁荣期到民国时期的逐渐衰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本文之前也已经陆续提到一些方面的原因，在这里系统总结如下：

1、药材经营者。经营药材业者，无论从生产^②、制造或贸易，一切仍然是沿袭的几千年来陈旧的方法及经验，面对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与产业化，毫无竞争优势。

从药栈经营的人员设置来看，每一字号内外，冗员多而复杂，开支不合理；所用会计账目为旧式，所经营的损益并无精确的计算，所以历年亏损下来，危及本身资本。往往是在亏损到经营不下去倒闭之前并没有察觉，错过补救时间。

从人员关系来看，在此行业内向来为传统的师徒制度，更偏重于固有的资格及经验而不愿顺应时代的需求增进或训练新的商业知识或技能。外省各采办药材的商家，有些如粤商等与国外商人打交道，对于药材品质逐渐讲究，但省内销售字号却依然故我效率低下，如此供给不合需求，业务自然逐渐衰颓。

营销观念落后。药栈字号秉承传统观念，采办原货注重计较行情市价而

^①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76

^② 这里意义上的生产并非现代意义的现代农业生产；这里的生产有两方面的涵义：药材的采集(大规模的产业种植并未普及，少数药材如附子、川芎有专业户种植，其余大多数药材仍由“山客”采集)与药铺的加工。

不细看货物品质，热衷投机和压榨药农，且不知研究如何推广销路的方法，结果碰上市场萧条期反而得不偿失而亏损。

2、外界的竞争。西医及西药在中国的普及，致使信仰者日众，相关的西式医院、学校及药房逐渐密布全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中医与中药却仍然按本宣科、固步自封，毫无进步，势力日渐衰颓。西方医药对于中医中药呈现取而代之之势，而与中医中药在同一生命线上的药材贸易自然随之而越来越不振。而由于各省市场的普遍冷淡，使川省药材贸易量减弱，加上“洋种药材”与外省药材的竞争，更使之不振。

洋种药材主要是日本的产品，前文已经叙述英、德、日等国窃取我国药材种子自行栽培，然后制成西药销售，其中日本逐渐繁殖巨量的当归、川芎、黄连、泽泻、枳壳、大黄等药材，这些药材产量丰富、品质优异，加上经营方法得当，逐渐行销中国乃至欧美。

外省同样产品每年出产的丰歉会影响到四川市场的旺淡，如福建的建泻、浙江的麦冬、白芍的药材，由于这些省份在地理上具有优势地位，所以外省药材丰收时，川药市场的销量则锐减。

3、内乱的阻止。四川自民国元年以来两个军政府对峙，到1934年刘湘解除军阀防区制以来，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①，各军阀在各自防区内提取粮饷，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实际上成为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防区间关卡林立，捐税苛重，交通阻碍，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常使川药市场供给失调。如：“民二十二年七、八两月，由碧口载运当归十余船来渝，抵广元县属之三磊坝，适该地为共党占据，船不能行；‘中隔’渝埠，以至‘脱挡’，彼时因缺货之故，交易殆形断绝。”^②^③

4、金融条件不稳定。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对时局最为敏感的金融业迅速出现了债券跌价，资金外流，银根转紧，银行钱庄挤兑，利率趋高，投机活动猖獗等现象。特别是松沪会战爆发后，形式更为严峻，虽然国民政府财政部出台《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共七条，对提取存款加以限制。规定：“银行钱庄各种活期存款，如须向原存银行钱庄支取者，每户

^① 匡珊吉：《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② ‘中隔’及‘脱挡’：即不能到达销售地、与存底拖空、青黄不接之意，行业术语。

^③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民24年，第322页

只能照其存款余额，每星期提取百分之五，但每户每星期至多以提取法币 150 元为限。”^①但是实际情况仍然不能阻止权势人物的巨额资金外流，徒增人为的紧张情绪。

战争的爆发使进出口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药材业也不例外，大多因此受累。药材经营者均感金融枯窘，不易活动，介绍交易也不能垫款，以至市面极为停滞，贸易局面难以恢复。

5、市场的丧失。对内市场东北三省地广人众，一向是全国最大的药材消费市场之一，川产药材行销很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贸易停顿，川药完全停销。失去如此重要的市场，导致许多经营者无力维持经营。海外市场由于战争其间长江沿岸重要口岸如武汉、南京、上海以及沿海口岸基本为日本所占领，出口困难，基本上失去了海外市场。消费者市场的丧失对小规模经营的药商来说打击是致命的，众药材经营者纷纷破产倒闭。

6、捐税繁苛。四川苛捐杂税的繁多，是四川药材业衰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我们将在下节集中阐述。

此外，运输线路改变导致销场转变，运输途中损失较大。“9·18”事变后，药材内外销场缩小，海口封锁，交通运输不便，向省内外购销药材困难。川产药材大批腐烂，市场交易额及输出量急剧下降。据重庆药材公会统计，民国 22 年输出总值为 3366375 元，分别比民国 20 年、21 年计减 2819998 元和 840736 元。停贸字号，接踵出现。如重庆的同义长、天福同、兴盛荣等 30 余家，宣告歇业。1945 年抗战胜利后，药材业虽曾一度好转，但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狂涨，法币贬值，大批西药在“救济物资”的名义下运往我国倾销，中药受到排斥，生产、经营日趋萧条。此外，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将其在中国内地所窃得的川药种子栽培成功，并制成西药倾销。“德国柏林大学药学院院长枢密顾问汤姆斯教授(Geheimrat Prof. Dr. Thoms)曾亲来华搜集药物其标本室内陈列吾国名药殆数百种，并宣言愿代我国化验，指导我国药物事业，所得药物已得七十余种之多”^②英国传教士弗贝乐等人曾以游峨眉山为名，窃去川药种子 70 余种；日本更是设立药圃，大量种植附子、黄连、川芎、当归、泽泻、枳壳等药材，不仅自给，反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推销，甚至把

^① 彭通湖、刘方健：《四川近代经济史》，西南财大出版社，2000 年，第 489 页

^②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 10 月

大黄、当归、黄连制成膏丹丸散销往欧美各国：“德国达摩城之怡默克 E. Meuk Darmstalt、柏林之立德尔 j. D. Riedel Berlin、奇嘉 Geneand Go 等制药厂已纷纷采购我国药材制造新药，最显著者如怡默克药厂以吾川运之当归提取精质制造妇女痛经良药曰‘约门罗耳 Eumenol’，欧美各国皆已驰名”^①这些柏林几家大制药厂，将四川出产的贝母、当归、大黄、黄连、五倍子等药材制成西药，行销欧美各国，使我国中药材国际市场大大缩小。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处于崩溃时，外国输入四川的西药连年增加，充斥市场，中药经营深受排斥，许多药房逐步缩小为“夫妻店”。对外贸易也一落千丈。输出数曾经冠全国的姜黄，在抗战期间几乎一粒未出口，川芎、当归也减销 90%，曾畅销国内外的附子、贝母等特产名贵药材变成滞销品，四川药业日趋衰落^②。

4.2 四川的捐税

4.2.1 清末的捐输情况

在嘉庆以前，川省除田赋外的加征只有两次，一次是雍正年间征火耗银用于养廉银，一次是乾隆末年加征津贴作镇压白莲教起义军饷。但到清后期，由于社会动乱，用度浩繁，而财政支拙，因此赋税日益加重。如太平天国时期“以济军用”的捐输、辛丑条约四川摊派的 100 万两“新捐输”、甲午战后的肉厘、清末的盐税以及酒税、糖税、油捐、烟税等等。^③

虽然川省田赋较轻，但由于历次加征，民众的实际负担已增加不少，1903 年四川布政使称：“各属津捐率按正粮加至六七倍，多者犹不止此”^④。在清末影响最大的一项额外征收莫过于川路租股，具体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当受、大写、自耕、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⑤除征收租股外，同时实行购股、官股、土药股和盐茶股等形式来筹集路款，下表是 1908 年和 1909 年川路股额的组成^⑥：

^①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 10 月

^②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 29 年 10 月

^③ 参考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5 年，卷 1<田赋>

^④ 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5 年，卷 1<关税及研究糖油税>

^⑤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35 页

^⑥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171 页

路股类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宣统元年(1909年)	
	股额(两)	占总数比例(%)	股额(两)	占总数比例(%)
购股	69420	3.7	36.590	2.2
官股	37375	2.0	9875	0.6
租股	1519260	80.4	1343459	81.4
土药股	205099	10.9	196797	11.9
盐茶股	56661	3.0	64282	3.9
合计	1887815	100.0	1651003	100.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除租股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外(八成左右),捐税比例最重的要数土货药材股了,占11%左右。迄1911年川路股款共计筹集1670万两。

4.2.2 民国时期捐输情况

四川进入军阀混战年代后,各军阀拥兵自重,再没有编制全省各军的军费预算,军阀们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和其他行政费用,无不加强防区内的财政搜刮。田赋附加、预征粮税、逼种鸦片、滥征苛捐以及临时摊派层出不穷。仅以二十一军民国17年~民国23年的岁入为例,历年以所谓地方税、印花烟酒税、契杂税、其他赋税、税捐杂收入等科目收入的总和,已超过田赋正税和盐税,个别年代甚至还超过所谓禁烟收入。^①这些科目中的地方税,岁入最多,而其实就是各种苛捐,因为各个县乡还有未列入总数的自己的地方税。刘湘统一四川就任省主席后也不得不承认:“川省以往各县税捐名目繁多,局卡林立,商贾贸迁,留难滞阻,胥吏剥削,弊害尤甚,以至百业萧条,上下交困。”^②

一般省内运输药材,往往需要过关卡数十道,每道关卡需要交纳各式各样的捐输,虽然每道关卡所捐额不多,一般就几元,但整体下来,数目惊人,如以民国25年为例,运送大黄76包、当归75包由碧口船运至重庆,途中经过的关卡及捐输如下: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四章,18页

^②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四章,13页

药材沿路捐税表^①

(大黄 76 包当归 75 包)

地名	捐名	纳税数目(元)	地名	地名	纳税数目(元)
平武姚家渡	国防费	1.00	合川	江防	189.60
昭化自木街	查船杆子	2.00	同上	军费	71.20
广元三磊坝	护送	196.00	同上	勒索	95.96(照统捐六成抽收)
同上	统捐写字杆子票子	5.00	同上	各卡划子验票	132.31
同上	护送局长消费字杆子	6.00	同上	船票	3.50
同上	照票	2.00	同上	印花	6.05
同上	江防票	6.00	合川东津沱	照票杆子	12.00
同上	江防印花护送	1.00	合川盐井溪	国防	12.00
昭化黄金口	国防	3.00	同上	统照票筏子	2.50
昭化猫儿跳	国防	5.00	合川夏溪口	护商	117.00
昭化清油庙	国防	3.00	同上	同照票杆子	3.00
昭化晏溪口	国防	6.00	巴县北碚	照票	1.00
昭化亭子口	国防	3.00	同上沙嘴	护商牌照	5.00
昭化小占河	国防	3.00	江北水土沱	峡防票	24.00
昭化仓溪	护商	117.78	同上	同杆子包票	2.00(照护商值抽二)
同上	护商写字杆子	36.00	江北悦来场	峡防	12.00
保宁	验票	6.00(每百分抽一十)	同上		21.00
同上	护送	6.00	同上	同划子小费	0.30
同上	护送验票小费杆子	2.00	同上	峡划子勒索	2.00
同上	江防费	22.6(每件0.15元)	同上	峡防	122.26
同上	货捐验舟	2.00	同上	印花	1.50
保宁河鸡冠	护商江防收票	1.00	巴县磁器口	峡防验票	10.60
同上	国防	2.00	同上	印花	1.50
南部新镇坝	国防商会学捐	1.50	江北相国寺	进关验票	3.00
南部傅里场	国防	0.50	同上	烟酒验票	
南部正源场	国防	0.50	同上	江防同	
南部罗家场	国防	0.50	同上	渝北护商	
南部周口	国防	0.50	同上	同杆子验票	
南部龙门场	护商进关挂号	1.00	同上	斗息局	
顺庆	江防货捐	6.00	同上	峡防	
同上	护商	42.28	同上	同验票	
同上	同杆子	2.00	同上	江防	
顺庆照爷庙	同验票	3.00	同上	同划子	
顺庆李渡场	国防	1.00	同上	禁烟查缉划子	
顺庆油扎溪	护商	45.30	同上	卷烟税	
同上	同验票杆子	2.00	同上	印花	
顺庆列沔溪	护商	62.73(大黄每件0.48元当归)	同上	渝护商筏子验票	

^① 资料来源：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民25年，第374—376页

		每件 0.35 元)			
同上	同勒索小费	13.80	同上	船捐	
同上	同验费杆子	3.00	同上	江防进关	
武胜	印花	6.10	同上	巡河划子	
同行桑	同验票杆子	6.00			
武胜渠河嘴	江防	2.60			
合川	护商	259.30			

碧口至重庆，沿路共经过 33 个关卡，收取捐税 80 余种，总计共征捐税 1900 余元，按照当时的市价，这批药材成本计银 2000 余元，运抵重庆后不计交纳正税，光苛捐就将近成本价格。其中重庆江北相国寺的捐税种类最多，达 16 种之多，单项捐税超过 100 元的有七处，分别为广元三磊坝的“护送”196 元，昭化苍溪的“护商”117.78 元，合川的“护商”259.3 元、“江防”189.6 元、各卡划子验票费 132.31 元，合川夏溪口的“护商”117 元，江北悦来场的“峡防”122.26 元。各军阀以“护商”的名义，强行收取巨额的费用，直接导致药材贩运成本直线上升。如当归在山外成本每百斤约为 9.78 元，而税缴平均每百斤达 22 元，超过成本 2 倍以上。如果再加上山缴和其它杂缴，更不在此数。

碧口至重庆是药材运输的要道，但正因如此，沿途关卡林立，尤其从合川到重庆及由重庆出口，捐税更重。据统计，当时合川各种药材捐税如下：

合川药材捐税表(税额单位：元)(以每百斤计)^①

税目	红 芪	大 黄	当 归	党 参
统捐	0.25	0.12	0.15	0.37
江防	0.40	0.16	0.16	0.40
山防护商	0.16	0.16	0.16	0.16
峡防费	0.36	0.36	0.36	0.36
护商	0.40	0.40	0.40	0.40
澄江口护商	0.24	0.24	0.24	0.24
澄江口清乡费	0.24	0.24	0.24	0.24
峡防江面稽查	0.08	0.08	0.08	0.08
合计	2.13	1.76	1.79	2.25

至于这些药材自重庆出口到其它地区的捐税，则更加繁多：

^①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83 页

重庆药材出口捐税表(税额单位:元)(以每百斤计)^①

药名	关税	内地税	剿赤捐	统捐	剿赤捐	护商	剿赤捐	印花	自来水电力 厂马路	合计
红芪	4.16	2.22	0.22	0.95	0.10	0.17	0.02	0.01	1.54	9.40
大黄	2.40	1.28	0.13	1.00	0.10	0.17	0.02	0.01	0.92	6.03
当归	2.81	1.50	0.15	1.00	0.10	0.17	0.02	0.01	1.08	6.91
党参	3.07	1.64	0.16	0.95	0.10	0.17	0.02	0.01	1.18	7.31

川省捐税之苛重,上面列举的例子已然可见。药材商所受盘剥,或者停业,或者改道贩运,或者打包邮寄往销售地。但是这些途径都较为繁琐,运输成本也不低。

4.3 川药市场的衰落带来的结论及启示

我们并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很难解读。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赋予它们某种意义。作为当时时代的人,也许他无法看清时代的洪流,但是当我们作为未来的人来回顾这段历史,似乎能从中探寻出某个轨迹。

在以上各章中,我们研究了整个四川地区药材行业在近代动乱的背景下艰难的生存发展状况。力图说明整个药材行业,由于自身制度的陈旧性(行业机构与中药体制)和外界的环境因素而导致逐渐走向末路。当然这并非是一个行业的趋势,或许代表了整个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主要趋势。

应当承认,在整个社会经济成分中,这一行业无论从生产规模、参与人员以及所占经济成分的比重都极其有限,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甚至很少能找到将这一行业单独列出作为调查项,但它作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经济体系,在接受近代经济化的发展中,能够清晰的感觉到需要改变与自身发展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和束缚自己发展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得到发展的新生产力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②,旧式的学徒制、经营制度等不合时代潮流的东西被新式更合理的制度所取代。

^①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T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分析上述各章所描述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启示：

首先是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地理环境的封闭是造成四川近代药材市场衰落的客观中药原因。这看似和我们第一章所描述的有悖。其实不然，因为由于交通的困难，增加了中间转运和转卖的次数，增加了交易的风险，长途贩运成本甚高，往往无利可图。陆路交通不发达而以水运为主，而水运又主要依靠小木船。在缺乏近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药材行业发展的极限也可想而知。直至20世纪初，四川的交通困难的状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重庆海关税务司就指出：“……要在四川省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与外界联系，努力改善交通工具”^①。清廷外务部也认为：“川省物产充盈，必达之汉口，销路始畅，惟其间山峡崎岖，滩流冲突，水陆转运，皆有节节之虞，非修铁路以利转输，恐商务难期畅旺”^②显然，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制约了川省药材业的发展。

其次，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丧失，无法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主权，中国市场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独立的发展。最多也只能作为外国资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场所，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而药材业作为自身的优势行业，却节节消退。

由于近代四川商业市场属于半殖民地性质，国外列强试图改变四川的商品生产结构，使之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近代四川农业的生产不仅取决于自然，更取决于市场，市场关系的变动可以支配农民的耕种方式。商业性农业的繁荣与衰竭主要受资本主义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产量大起大落。或者说，整个四川的药材市场中药农也好、药商也好都没有市场主导权，药材价格由国内市场决定改为国际市场决定。世界市场的需求，国内经济的发展，促使小农经济商品化发展以及随国际市场的周期化运动，对中国的农业起了过去所没有的影响。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作用往往以直接主导的方式表现出来。近代史上，统一的国内市场未能形成、近代市场经济发育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政权的软弱，对此无所作为。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后进国家国内市场的形成、市场机制的建立，需要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和

^①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Chungking, 载《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国历史档案馆，2001年

^② 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引《轨政纪要初编》，轨3。

财政支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政府对市场的扶持，反倒是无尽的盘剥，在层层关卡中，我们看到了药材业的没落。

第三，缺乏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药材行业作为商品经济中的一种行业发展较大，但是没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商业资本继续封建化，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商业资本就像一条起伏不定的小船，缺乏封建地产的稳定性。而高额的地租不仅有厚利可图，还稳妥安全，这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在四川整个社会经济中，往往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上的货币资本不是向生产投资，而是集中在流通领域，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本膨胀后，便转向了土地兼并。作为传统的药材业经营者，没有人会思考将传统的中药行业如何现代化，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一个一个的数着发霉的铜板。

19 世纪四川自然经济的被破坏、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近代经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从药材市场的发展与繁荣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色相互协作并组成系统，运输、通讯、公共事业、金融等现代经济要素发展起来，各类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国内与国际市场等逐渐连接，交易范围越来越大，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经济所占的比重极其有限，其力量不足以冲破中国重重的历史障碍，也可以说，其经济力量还不足以冲破政治与社会的重重阻碍，所以在极端恶劣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药材市场如同昙花一现，最终没落下去。

参考文献

历史文献:

-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 《四川省之药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1934年
-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 《中国土产综览》,中国土产公司编印,1952年
- (清)董谷士、董炳文:《古今类传》,未学斋,清康熙31年刻本
-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五十二卷
- [日]《支那省别全志》1920年
-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四川省之桐油》1938年
- 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1891-1935)年来四川省进贸易统计》,重庆民生实业经济研究室,1936年
- [日]《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四川省》,1946年
- 《四川官报》戊申第2册,“奏议”
- (宋)周询:《蜀海众谈》,卷1
- (清)康熙《清实录》,卷3
-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附录〈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科学出版社,1955年
- 中国农民银行编《四川省经济调查报告》,1940年
- 许涤新:《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载《中国农村问题》,1936年
- 明《食物本草》卷二,
- 同治《彰明县志》,卷57
- 民国《崇庆县志》,谢汝霖修,巴蜀书社,1992年版
- 《山货业与药材业近况》,《四川月报》,第1卷2期,1941年

(清)《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民国35年

杨显东,谭炳杰:《四川省之药材》,《农业丛刊》第24号,第24期,1941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三,医家类

光绪《巫山县乡土志》,卷三

重庆中国银行编《四川省之山货》下卷,民国24年

四川省政府:《四川省概况》,1939年

钟占熙:《四川药材市场概况》,《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2期,1946年

光绪《灌县志》,卷1

(清)徐昱:《灌县乡土志》,都江堰图书馆,2006年版

《灌县经济概况》,《四川月报》,1938年5、6月,第12卷

《重庆近三年来之药材业》,《四川月报》,第10卷6期,1937年

[日]根岸佑:《清国商业综览》第5篇,〈清国货币及银行〉

《四川第四次劝业统计表》第36表,四川劝业道署编印,1910年

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78页

《商业:抗战起后灌县之市场概况》,《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6期,1938年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民国29年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

(清)陈毅:《轨政纪要初编》,卷3

《灌县志》,叶大镛等据民国22年重修影印本,巴蜀书社,1992年

[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二册

李作周:《中国底田赋与农民》,载《新创造》1932年7月,21卷

现代文献类:

王永年、谢放:《近代四川市场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期

王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

周开庆:《四川经济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

鲁子健:《近代四川的土药经营》,《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2期

严奇岩:《近代四川山货开发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 陈镜颖：《四川药材贸易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
-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年
- 张学君、杜受祜：《近现代四川经济场镇经济志》，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中华书局，1982 年
-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1957 年
- 马继兴：《宋代的民营药局》，中国医学杂志，1992 年，（增刊），第 3 期
- 仲春明：《中国的庙会市场》，上海经济研究，1987 年，第五期
- 周汶、徐国成：《古今药都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王继贵：《四川林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周勇、刘景修：《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
-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四川省交通厅地方交通史志编筹委员会：《四川内河航运史料汇集》，1985 年
- 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 年
- 《四川内河航运史》，第 16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彭通湖、刘方健：《四川近代经济史》，西南财大出版社，2000 年
- 《四川公路大事记》，四川交通厅公路局
- 四川省交通厅史志编委会编：《四川公路交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 年
- 费孝通：《九访江村》，《费孝通学术精华录》，第 1 辑，北师大出版社，1988 年
- [美]G. 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1, 1964.
- 周汶：《古今药都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 年
- 《四川药材业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四川委员会编
-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年

-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
- 史继刚：《宋代药局建设与药品经营管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 靳秀梅：《宋元明清药肆初探》，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6月
- 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
-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 四川地方志编委会《万县市志》，重庆出版社，2001年
- 万县商业局：《万县商业志》，1990年
-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
-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 《票号在四川的一些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 匡珊吉：《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5年，卷1
-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Chungking, 载《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国历史档案馆，2001年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 陈岗：《近代四川商业性副业》，《古今农业》，2006年2期
- 田永秀：《近代四川沿江中小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 唐廷猷：《中国古代的药市与当代的药交会》，《中国药学杂志》，1997年3月第32卷第3期
- 四川省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编：《四川省中药资源普查目录》，1986年
- 李荣昌、沈祖炜、杜恂诚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后 记

本文自零八年三月开题以来经过近两个月的收集资料的准备，于 5 月开始动笔，至八月完成初稿，感触颇深。

首先是历史资料的收集，做为了一篇经济史论文，选题方面旨在领域内尚无人研究为最好，但是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必须要有充分的一手资料，而面对浩瀚海洋般的资料，常常不知从何处入手，只有一本一本、一篇一篇的阅读，然后提取自认为符合主题的信息，对着堆满灰尘、字迹难辨的这批民国时期旧资料，是一个非常考验人耐心的事情。其次在论文的撰写上，很难忘记的是面对许多繁体字与生僻字的情况下的束手无策，只有在写作论文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知识水平有限和不足。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本人仍然感觉论文还有许多方面存在不足，需要完善与补充。

另外，本人在三月选题之时，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此领域上鲜有学者研究，岂知十一月在中国知网添加的零八年毕业生论文中，川大陈镜颖同学选题也是关于四川药材贸易方面，对于未能成为研究此领域的第一人深感遗憾。

致 谢

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曾经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感谢我的恩师刘方健教授。本论文是在刘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刘老师从论文的选题、结构设计、研究方法与内容以及论文的最后定稿，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作为一名学者，刘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宽厚待人的高尚品格，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两年多跟随恩师的学习，不仅使我在学业上有所收获，最重要的事跟随在恩师身边做事，让我从恩师身上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原则，这将使我终生受益。在此，我向刘老师表示真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其次感谢另一位恩师史继刚教授。史老师学识渊博，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有着厚实的理论功底。两年多来，史老师以他独特的心得与经验，向我们传授先进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史老师还是位在学术上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在生活上又是非常随和的人。刘老师和史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适时地鼓励和引导，以及为我提供的资料，使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完成和完善论文。

在我两年多的学习以及论文准备过程中，老师和同学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感谢西南财大图书馆长缪明杨教授以及货币博物馆的梁小鸣老师、黄朗老师、李蓉老师和彭黎老师，她们在这两年的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助。同时还要感谢柯伟明、师兄高玮和师姐朱琳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感谢在此未能一一提及名字，但给予我各方面帮助的老师、前辈、同学和朋友们，你们给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是我学习和成长的动力。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父母，这些年来，是你们默默的关怀和支持，鼓励着我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顺利完成学业。

最后，对文章撰写过程中，参阅及引用的相关资料的作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深感本人知识结构和水平有限，本文不免有不足之处，请各位老师提出宝贵意见，期待大家的指正。

尚 元

2008-12-02